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洪继东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潘 漫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徐东海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思东 陈 思 姚华庭 郭晓东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6年第2期 总第160期
双月刊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王天海 徐晓婷 张 丽
杨 玲

政党制度

- 人民政协的本体定位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 樊士博 陈 娜 4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理论分析、价值意蕴与发挥路径 / 梁晓宇 李文迪 14

中国式现代化

-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意蕴、内涵要求与实践路径 / 洪向华 李 娜 21
- 扣好“第一粒扣子”: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进路 / 柴 奕 29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6 年 4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新的社会阶层·建设力

- 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机制研究 / 郭晓东 37
- 讲好中国故事视域下数字创意群体建设力研究:内涵、实践与统战工作路径 / 张伟伟 吉 强 46
- 人工智能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作用机制、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 / 方锦波 王 智 54

中华文化

-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出场语境、范式特征与策略方法 / 孟 朝 周安忠 62
- 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底层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 罗 兰 71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6 - 02

人民政协的本体定位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樊士博 陈 娜

摘 要:从本体论视角审视,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人民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长期以来,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图谱构成了知识体系构建的主要进路。然而,面对人民政协覆盖领域广泛、专业程度较高的现实境况,单纯学科化的知识构建路径已面临诸多结构性局限。因此,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须超越单一学科范式,运用概念化、结构化等多种方式,构建起兼具主体性、系统性与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为加快构建这一知识体系,应坚持多措并举:立足主体自觉,提炼具有原创性与标识性的核心概念;坚持一体思维,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跨学科的知识对话与理论融合;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实践课题,形成具有现实解释力的理论成果;注重话语构建,统筹学术表达与大众传播,讲好中国协商民主的当代故事。

关键词:人民政协;知识体系;本体论;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创新实

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3]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阐述中国道路、分析中国现象、诠释中国优势的重要任务。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知识社会”向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时代命题。理解自主知识体系,需以厘清知识网络为前提。在人类历史上,知识体系始终处在动态的稳定中,既能保持基本形态,也能不断吸纳新质。既有的知识体系构建方式大致可分三种,即概念化路径、结构化路径和问题化路径。概念化路径是传统方法,标识性概念的提

收稿日期:2026-01-07

作者简介: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建;陈娜,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风腐同查同治的统合逻辑与实践机制研究”(25CDJ0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炼与择取有利于加速知识体系传播,扩大知识的运用范围。不过,由于概念化路径过度关注定义中的要素,极易导致知识体系的碎片化。结构化路径表现为学科化追求,形成了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构建方式。近代社会分科治学以来,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占据主流。但随着跨学科、多学科研究范式的勃兴,这种知识体系构建方式开始显露不足。这要求更改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从学科“条条”上的知识体系向“块块”上的知识体系融通转型。问题化路径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应然之举,但目前并未充分展开。知识的价值在于运用,被运用了的知识才能验证科学性。构建知识体系的三种方式并不是平行的,而是交叉共通的,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从知识体系走向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凭空加了“自主”二字,而是对其适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14]。新时代的自主知识体系应以中国实践为出发点,真正将“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贯通在研究进路中。

截至目前,学界对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专论不多,散见于相关学科领域的论述中。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历史出发,梳理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由来。有学者用政协章程演进视角,探讨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5]。也有学者依据历史发展脉络,厘清这一体系赖以确立和发展的政治依据、社会依据与组织依据^[6]。二是从职能出发,聚焦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构成。学者们重点围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基本职能,就协商民主制度^[7]、协商式监督^[8]、知情明政^[9]等方面展开研究。三是从过程出发,剖析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功能。有学者强调人民政协知识体系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10]。也有学者立足中国具体的政治架构、整体与部分相统一的底层逻辑,探讨其与全过程人民民主^[11]、新型政党制度^[12]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有学者从国际视域出发,强调提炼中国协商民

主、政党制度等经验,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现有研究为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呈现出整体性挂一漏万、针对性失准不足等问题。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13]。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为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土壤。本文尝试运用概念化、结构化、问题化三种方式,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实践优势与文化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构建起兼具主体性、系统性与实践性的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

二、出发点: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 本体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通过有效工作,努力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14]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人民政协的重要定位。举凡知识体系均是本体的言说,是本体向外传递观念的系统化表达,厘清知识体系的本体具有基础性意义。哲学视域下的本体,向内指涉事物本质性的存在,向外表现为不同的面相。从实践来看,知识体系应该是组织在特定制度框架下,关于自身实践的整体性叙事。因此,人民政协知识体系也包含组织本体、制度本体与实践本体三个面相。

(一)组织本体: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 阵地

所有知识体系都建立在回答“组织为何”的前提基础上,越是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其主体便越明确。从组织本体稽考知识体系,是揭示其自主性的应有之义。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汇聚各方智慧、推动决策优化的重要角色,是最具包容性、整合力的政治组织。人民政协组织构成具有鲜明特色。“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代表人士在各级政协中占有较大比例,换届时委员不少于60%,常委不少于65%;各级政协

领导班子中副主席不少于 50%（不包括民族自治地方）。”^[15] 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政协，整合多元社会共识，完成向特定群体的政策解释，进而将党的领导贯穿各个领域。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须从其组织本体展开，揭示内部运转的复杂机理。

组织功能是由本体的实践产生，反映着知识体系的理论化进程。因此，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须立足组织功能本身。首先，人民政协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参与国家和社会重大事务。区别于人民代表大会“地域性代表”的组织逻辑，人民政协遵循着“社会结构性代表”的组织逻辑。通过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能够掌握社会公共意见的实际情况，这有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其次，人民政协通过民主监督的方式，获取政策的效力反馈。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坦诚沟通和持续反馈，形成对公权力运行的外部约束，进而达到规范、透明、高效的要求。最后，人民政协通过参政议政，为党领导各项工作建言献策。不同党派、各族各界人士能够借助人民政协，知情明政、建言议政。政协委员结构多元、代表广泛、专业突出，既能反映群体关切，又能立足知识背景提出高质量建议。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平台，人民政协通过参政议政有效传导社会信息、凝聚群体智慧、调节利益关系，使决策更具包容性、精准性和前瞻性。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要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运作机理作为重要资源贯穿其中，不断凸显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在知识体系框架中的本体定位。

（二）制度本体：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

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1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增强开展统一战线

工作的责任担当，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17]

人民政协是一种制度化实践，制度性是人民政协能够长期存在的关键。人民政协的制度本体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中，形成了独特的包容型团结与协商型民主，实现了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有机统一^[18]。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政治组织的知识体系本质上就是关于制度的知识网络。缺乏制度化，组织化便无从谈起。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须以制度本体为基准，深入挖掘与人民政协密切相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一，人民政协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民主的理念早已成为共识，但民主的形式却千差万别。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机贯通。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框架下，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通过平等对话、理性沟通，将各自的政治观点和利益诉求进行充分表达，成为治国理政的民意资源。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人民政协制度本体的核心支撑。新型政党制度既区别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权力博弈，也不同于一党制的封闭运行，具有真实的代表性、有效的动员性、高度的整合性以及巨大的包容性等优势^[19]。人民政协通过多种制度化形式，汇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共识与磅礴力量。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政协制度本体注入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结构支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以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维护民族平等与团结为原则。人民政协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独有的制度形态，构建其知识体系必须阐释好制度运行逻辑。只有嵌入中国复合型政治体系的运作场域，才能理解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价值指向，更好为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

（三）实践本体：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

在社会结构变动日益频繁的情势下，社会意见更加分散，增进共识的难度呈现指数级增长。化解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张力，就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议题，而人民政协就是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渠道之一。

一方面，人民政协的实践本体首先体现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使命上。这一使命要求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须走向融通之道，而不能区隔自我。从世情看，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东升西降已成历史趋势。从国情看，中国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社会结构深刻重塑、意识形态斗争甚嚣尘上。从党情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锻造一个具有强大整合力的政党更加艰巨。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多元诉求对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有鉴于此，人民政协能够实现政治目标与社会意愿、国家政策与公众关切同向同行，进一步夯实了党的长期执政基础。

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致力于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面临着阶层分化、利益多元、思潮交锋的复杂形势，社会整合成为国家治理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界别划分是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重要方式和工作手段。最新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20]界别划分为凝聚特定团体和对象的共识奠定了基础。界别划分也是与时俱进的，2023年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增设“环境资源界”，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合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

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共设34个界别。此次调整增强了政协的代表性，反映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变迁，优化政协界别设置有利于发挥其独特政治功能^[21]。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将社会的结构变迁以组织化方式纳入政治体系中，使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现实关切在制度框架内有效表达，最终弥合分散意见、达成社会共识。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本体出发，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不断阐释好人民政协的实践优势。

三、支撑点：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把握的四对关系

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处理纷繁复杂的关系，而不能只是机械地拼凑概念。因此，推进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深入理解和妥善把握若干关键关系。只有在把握内部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范式，才能构建出既扎根中国政治场域又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知识体系框架。

（一）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知识永远伴随着情感和目的等诸多附加^[22]。知识体系作为一整套完整的解释框架，既受以往经验的制约，也受当代实践的影响。构建知识体系必须追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韦伯提出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范式，前者追求行动的终极价值，后者强调实现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的条件和手段^[23]。对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而言，同样应该坚持价值性与工具性的辩证统一，既要讲清楚人民政协在价值层面的意义，又要阐明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系统中的效能。

一方面，人民政协的价值性表现为人民性，知识体系的价值性表现为一定的学术立场。人民性是人民政协制度设计的价值起点，更是构建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立足点。人民政协的群体代表机制是利益、意见和社会视角融为一体的复合型代表机制，对人大制度的地域代表制进行了有益补充^[24]。意见的有效接收，反馈的正向吸纳，

使得社会冲突始终控制在人民政协的有效解决框架内。

另一方面，人民政协的工具性表现为功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调社会关系变化的制度性框架，彰显了实用性和有效性的一面。人民政协知识体系需要充分阐述其发挥功能的政治传统，进而构建起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系统。例如，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方式。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以来，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板块共提出提案 6019 件，经审查立案 5091 件。立案提案中，委员提案 4609 件、集体提案 482 件，其中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提案 354 件。遴选并督办重点提案 77 项，99.9% 的提案已经办复^[25]。政协以提案工作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体现出人民政协的实践性品质。这些工具性的手段必定在人民政协知识体系中占据位置，必须加以系统化、理论化。

（二）内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人民政协是中国政治实践的产物，带有中国政治传统的深刻烙印，展现出极强的内生性。这种内生性主要体现为扎根本土的问题意识、制度基因与叙事形态。具有内生性的人民政协，同样需要保持开放态度，不断吸纳新质。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与外部政治文明成果的对话能力，以及对跨体系知识要素的批判性借鉴。阐述内生性，不能忽视开放性。近代以来，关于体用关系的争论不绝于耳，明体达用已成为共识。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既要立足本体，也要求索域外，用好“他山之石”，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内生性为开放性提供主体根基，开放性为内生性注入发展动能，二者在人民政协制度的成熟过程中呈现出相互塑造、协同演进的发展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人民政协六十五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

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26]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须传承好“民为邦本”“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等优秀文化传统。深层文化心理为中国现代政治发展提供了连续性支撑，支撑了人民政协的政治运作。因此，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然要从中国政治制度自身的历史逻辑和本土语境出发。

然而，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若仅强调内生性，就可能陷入闭门造车的困境。拒斥外来、全盘接受，都不是科学态度。开放性具有双重要求：一是多学科的开放；二是跨国界的甄别性交互。知识体系如果封闭，就会导致“自说自话”，无法向世界解释中国政治制度优势。开放性的知识体系具有生命力，能够通过自由平等地对话、讨论，使得多元主体交换意见和诉求^[27]。就人民政协的实践而言，其知识体系构建必须秉持开放性，不断拓宽眼界。以双周座谈会为例，2025 年，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召开的双周协商座谈会涉及众多议题，涵盖经济转型、新质生产力发展、民族与宗教问题、生态治理、民生福祉、社会治理、外交战略等。就这些问题参政议政，人民政协的知识体系就不能局限在单一学科、单一领域、单一经验上，而必须经由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互动，坚持构建开放性知识网络。开放性也意味着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须回应全球政治文明的对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28]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原创性的制度经验，不是政治制度的点缀，而是当代中国知识体系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人民政协知识体系承担了讲好中国民主故事、吸收国外民主发展有益经验的重要功能。

（三）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关系是理解人民政协知识体系演进的底层逻辑。作为承担协商建国重大使命的人民政协，其制度功能、政治定位都深深镌刻着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印记。只有准确把握

人民政协的自身历史与关系互动，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进而厚植其自主知识体系的稳固基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面对人民政协存续与否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29]。现行宪法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30]这是对人民政协在法理层面的确认。

通过广泛代表性和制度化协商，人民政协成为国家与社会进行有效沟通、良性互动的桥梁。从继承性看，人民政协自始至终具有整合社会资源、汇聚政治合力的统一战线作用。可见，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始于当下，而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基础上。当前关于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努力，实则作为一种基于既有知识传统的接续性发展。若脱离这一历史连续性与知识继承性，则易陷入理论无源、实践无根的困境。唯有在充分承认并吸收既往理论积淀与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其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构建才能释放出可持续的学理生命力与现实解释力。此外，伴随时代演进，人民政协的制度调适亦持续展开，必然推动知识体系内容上的更新。例如，提案工作与社情民意反映机制逐步规范化，调查研究与委员履职制度持续深化，共同构成了日臻完善的制度格局。这些制度创新不仅是人民政协实践发展的重要体现，也为构建其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对象和议题。通过对这些创新实践进行理论化提炼与学理化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方能彰显时代性与创新性。

（四）解释性与传播性的统一

人民政协知识体系作为中国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其根本生命力在于对政治现实的深刻解释力。这种解释力构成了阐释人民政协

价值与功能正当性的理论基础。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解释性要求，对内须系统回应“人民政协何以成立、何以存续”的本体论问题，对外须清晰阐明“人民政协如何运转、如何发展”的机制论问题。只有在具备科学解释力的前提下，人民政协知识体系才可能获得有效传播，进而塑造良好形象，并在更广泛的政治话语空间中确立其“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权威。

以人民政协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实践，其创新性与复杂性已超出既有西方学术范式，亟待建立具有充分解释力的自主知识体系来弥合。库恩指出，科学家在决定拒斥一个范式的同时，总是决定接受另一个范式^[31]。因此，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解释性与传播性的统一，即兼具理论自明性与话语影响力。解释性功能通过彰显主体价值，揭示人民政协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组织功能与政治功能。人民政协是中国特色政党治理的重要平台，它并不强调单一政党的内部治理，而是多党合作的党际治理、关系治理。就此而言，人民政协的功能不是竞争性的、对抗性的，而是沟通性的、合作性的。作为协商民主的载体渠道，人民政协知识体系需面向多元主体，借助可理解、可接受的叙事方式，使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传播性有利于跨越语境差异，形成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可进行文明间对话的观念表达，从而在价值传播与认同构建中实现从故事到知识的升华。因此，传播性具有双重指向：对内须清晰阐释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逻辑与治理效能；对外须主动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主张与价值追求。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讲好中国民主故事与协商民主实践，已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议题。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民主制度的重要构成，其知识体系必然承担向世界说明中国民主形态的使命。因此，传播性不仅是话语传递的技术过程，更是政治能力与文明表达能力的集中体现。

四、落脚点：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知识体系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文化体系必须具有较高的融贯性，否则不能称之为系统”^[32]。由于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领域涵盖性与工作的高度专业化，其知识体系的构建须超越传统学科化范式的局限，转向一种综合化、集成式的发展路径。这不仅是对单一学科知识构建传统的积极扬弃，也顺应了知识社会动态演进的发展趋势。

（一）从主体出发：提炼标识性概念

概念是构建知识大厦的基石，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单元，也是对感知事物的抽象化、清晰化与条理化^[33]。严格规范的概念体系，有助于厘清问题。康德曾说：“当吾人促动一知识能力，视其所缘境遇之异，乃有种种概念之显现，且使其能力显示于吾人之前，此等概念又容许按观察时期之久暂及注意之敏捷，以较大或较小之完备程度集合之。”^[34]若仅仅依靠认知能力在不同经验情境中收集显现的零散概念，则无法形成真正系统化、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梁启超认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之，横说之。”^[35]这里的定义即概念。在当前的人类认知结构中，构建知识体系断然离不开标识性概念。若要保持知识体系有机体的健康成长，就必须构建以本土标识性概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继而反映重大实践^[36]。毛泽东指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37]。毛泽东关于概念定义的论述，阐明了概念是揭示对象及其内部联系的符号，强调了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38]提炼标识性概念已经成为构建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民政协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旨在强化主体、凸显意义，提升理论

上的解释力、实践中的指导性。《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研究手册》中列明的“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一国两制”^[39]等均与人民政协知识体系有密切关联。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一批具有原创性意义的标识性概念。例如，“大统战工作格局”“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这些标识性概念既是实践经验的理论表达，也是融贯不同学科知识的结合成果，是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关键节点。经由这些概念，人民政协知识体系跳出了外源性解释框架，在中国特色上日益深化。进一步说，提炼标识性概念不仅关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更关乎价值观确立的立场。人民政协作为我国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优势、运作逻辑与实践智慧只有通过具有中国本土意涵的标识性概念加以表达，才能使其知识体系根深叶茂。如果没有自主的、内生的、原创的概念表达，实践经验就难以上升为稳定的理论结构，便难以形成知识体系，更谈不上“自主”的知识体系。在未来的理论构建中，应自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解释范式，将具有中国原创性与标识性的概念体系融入全球知识谱系，为推动人类思想体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贡献中国智慧，从而更有效地传递中国学术话语与理论主张。

（二）循一体贯通：促进学科对话

知识专门化使得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认知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知识领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科边界固化，限制了人类思维^[40]。随着现实问题的复杂化，单一学科知识已难以有效应对，知识生产正由分化走向合流，学科交叉和融通日益加速。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促进平等对话。人民政协涉及领域众多，正说明其知识体系也应该内通外联，从多学科中吸纳资源。将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固定在单一学科上，会导致自

我设限、作茧自缚。从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学科供给来看,可划分为核心供给、基础支撑、辅助延展三部分。

第一,要从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核心内涵。人民政协坚持党的领导,在党建国家的逻辑下遵循法治规范正常运转。因此,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须从政治学的已有共识中寻找阐释资源。政治组织的一般性结论和规律性原理,在人民政协的实践场域中同样适用。此外,人民政协发展历史长、底蕴深,必须从历史视角、传统维度探察其文明根基和价值基础。这就要求在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时,必须充分考量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撑作用。事实上,人民政协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凝聚共识、共商国是的历史。

第二,要从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中厚植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基础支撑。学科交叉、知识交融,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知识图谱。人民政协涉及民族宗教事务、边疆地区治理等事务,因此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须向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延伸,了解民族融合的历史规律。

第三,要从教育学、经济学以及部分交叉学科中吸纳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资源。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具有广延性。例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单元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民族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注重吸取体育学的知识。面向未来,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对话,以对话凝聚共识,打造更具系统性的思想框架。

(三) 向问题行进:回答实践课题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41]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是有有效性的试金石。向着问题出发,既是人民政协履职的工作逻辑,更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人民政协在与国家中心任务同向协行的

过程中,通过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推动着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发展。只有不断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让人民政协知识体系释放有效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机遇和挑战并存,需要在攻坚克难中向前进步。无论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之问,还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这些急难愁盼问题的人民之问,抑或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世界之问,人民政协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中都无法回避。

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超越对既有经验的简单归纳或对外来话语的机械移植,着力打造一套具备充分问题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的概念、范畴与原理系统。具体而言,应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路径,稳步推进知识体系建设。首先,立足实践本源。在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时,必须紧扣人民政协履职的实际进程,从协商议政、调研考察、提案督办等具体实践中提炼真实问题,使知识体系始终源于实际、指向实际,从而避免理论构建脱离实践经验。其次,推动认识升华。要系统梳理与总结人民政协在实践中形成的有效工作方法和问题解决机制,将分散、感性的经验材料,凝练为具有标识意义和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与知识形态。最后,坚持再实践导向。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宗旨在于回应现实、解决问题,其科学性与有效性必须经受实践的反复检验。应主动将已形成的理论成果运用于政协工作的具体场景,通过实践验证其适用性与解释力,并依据实践反馈不断修正、拓展与深化理论内涵,从而实现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在持续迭代中自我完善。

(四) 以话语统合:讲好时代故事

话语决定着“人类的科学”^[42]。知识体系最终表现为话语体系,话语不只是表象上的语言问题,而是认识问题、理论问题。知识的关键力量源于承认一切形式的人类经验都是经过中介的^[43]。中介有多种表现形式,话语是关键一种。要让世

界理解中国，就必须在话语表达上积极对接世界叙述框架，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话语体系。强调话语对接，并不是要全盘接受西方话语，而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基础上增强话语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44]。理论自觉和话语自觉是构建知识体系的两个方面。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就是要以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从中国经验中提炼中国智慧，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在世界范围内，西方话语长期主导文明叙事，中国的民主实践、政党实践常被置于污名化境地，导致西方部分民众混乱甚至错误地理解中国。究其根本，在于中国长期缺乏强有力的话语体系，在西方编织的传播规则中听不到中国声音。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必须将中国政治实践的独特性观念传递出去，让“以中国为方法”成为可被倾听的倡导。议题设置的规划性、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协商形式的多样性、成果转化的制度性，这些都是人民政协的话语亮点。

构建反映人民政协实践的话语框架，才能破除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存在的“失语”“失声”困境。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话语体系决定着知识体系的影响边界。自主的话语表达最终会沉淀为自主的概念、自主的理论和自主的知识体系。有关人民政协的理论研究，只有形成既能讲好中国故事、又能进行国际对话的话语体系，才能实现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人民政协知识体系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面向未来，既要在内容上解释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的优势，向世界阐明人民政协的功能与作用；又要在形式上改变人民政协知识体系的传播途径，借助互联网阐释人民政协故事。

五、结语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目标，是锻造以中华文明为背景的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45]。构

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关乎长远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一项系统性的战略任务。这既要求深入把握人民政协的组织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也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语境，并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具有中国立场的理论回应。构建人民政协知识体系，不仅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的塑造与传播，更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在持续推进这一知识体系深化完善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价值性与工具性相互贯通、彼此促进，在历史纵深与现实关切中锚定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在中国话语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开拓共识性认知路径，最终形成具有原创性、标识性与解释力的自主知识成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78.
- [2]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2).
- [3]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49.
- [4] 唐国平，陈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自主”：命题形成、本质透视与现实指向[J].社会主义研究，2025(5)：62.
- [5] 时昊苏，姚俭建.人民政协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以政协章程文本演进为视角[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3)：107.
- [6] 吕其镁，陈光辉，刘世华.历史与现实双重视角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发展路径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7(1)：6.
- [7] 陈宏宇.政治协商：基本内涵与实践探索——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职能为例的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0)：54.
- [8] 马雪松，冯源.协商式监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责任逻辑、制度体系与实践路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0.

- [9] 束贇. 基础性共识与基座型平台: 人民政协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与位置 [J]. 社会科学, 2024(12): 102.
- [10] 樊士博, 张雨婷. 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生成基础与学理阐释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2): 45.
- [11] 周淑真. 人民政协: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制度载体——历史逻辑、方位体现与职能机制考察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2): 20.
- [12] 何虎生, 曹玮青. 深刻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道理学理哲理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5(1): 28.
- [13][28][38][4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8、18、24、14.
- [14][17]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9、6.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政府白皮书汇编 (2021 年)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51.
- [16]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王冠华, 刘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0.
- [18] 张铮, 李政华. 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功能角色研究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4(6): 67.
- [19] 罗峰. 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及其发挥——人民政协视角的分析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1): 177.
-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2-23.
- [21] 孙金诚. 界别调整 因应时代 [N]. 人民政协报, 2023-03-05(3).
- [22] 怀特海. 观念的探险 [M]. 杨富斌,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5: 5.
- [23] 韦伯. 经济与社会: 第一卷 [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0: 114-115.
- [24] 谈火生, 侯听饶. 人民政协复合型群体代表机制探析 [J]. 教学与研究, 2023(6): 71.
- [25] 蒋作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5-03-11(4).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67.
- [27] 韩志明. 过程即是意义——协商民主的过程阐释及其治理价值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2): 55.
-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九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317.
-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3: 7.
- [31]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M]. 张卜天,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130.
- [32]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 [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23.
- [33] 朱光磊, 王智睿. 中国“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与社会建构 [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2): 95.
- [34]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M]. 蓝公武,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3: 67.
- [35] 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45.
- [36] 郭忠华. 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5): 74.
- [37]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85.
- [39] 苏长和, 周凌一. 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研究手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 1-2.
- [40] 伯克. 知识社会史 (下卷): 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 [M]. 汪一帆, 赵博因,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179.
- [42] 福柯. 知识考古学 [M]. 谢强, 马月,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31.
- [43] 德兰蒂.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知识、权力与自我 [M]. 李瑞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3.
- [44] 毛泽东文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192.
- [45] 王学典.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三重路径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5(21): 12.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 理论分析、价值意蕴与发挥路径

梁晓宇 李文迪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凝聚着几代人的集体智慧,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探索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协力攻坚克难、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和专项民主监督的实践中发挥强大作用。新时代,应从坚持党的领导优势、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机制、发挥民主党派自身优势等方面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民主党派

一、引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彰显出制度优势。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问题,学界从价值认同、体制机制、参政党自身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等视角展开了深入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在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凝聚共识层面,彰显出重要的政治治理效能优势”^[1]。何维认为,要通过提高参政党建设水平,“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打造高素质参政党队伍”^[2],从而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张毅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任务非常艰巨,“必须进一步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

以更加高效的政党制度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3]。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具体来说,要综合三方面因素加以思考。一是效能的基本概念;二是中国多党合作实践效能发挥的主要表现;三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及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阐释。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不足,本研究试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研究提供实践关照和理论支撑。

在多党合作领域,要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着眼提升中国新型政

收稿日期:2025-11-17

作者简介:梁晓宇,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思想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与新型政党制度;李文迪,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23BKS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制度效能”^[4]。效能作为一个概念最早产生并应用于物理学，是评价物体运动及其能量的释放和效果，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行政学，用于评价社会活动发展基本状况。效能的基本概念涉及“效”和“能”。所谓“效”，指的是外在效率、绩效和效果；所谓“能”，指的是功能、能力和潜力。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效能与功能密不可分，功能是这一制度的内在属性，而效能是这一制度功能在实践层面的表现。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以来取得的成就和实践发展，其效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实践中展示出的比较优势。相对于西方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展示出的效能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现协力攻坚，高效务实的民主决策，系统完备的专项民主监督。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发挥的理论分析

（一）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的重要前提

制度具备优势不代表该制度能够自动获得话语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5]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存在时间较长，发达的经济水平能够给予其话语发展足够支撑，这使其政党制度容易占据话语权高地。中国现代化建设起步晚，且部分西方国家以“中国威胁论”“中国阴谋论”等新冷战思维对中国发展进行遏制，这些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处在话语劣势中。面对西方话语霸权，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效能，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说服力。一方面，制度效能的提升意味着该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实践中取得的成功是对西方言论的最有力驳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推动了国家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助力国家在经济建设、

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为制度本身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可和尊重。另一方面，实践结果的影响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而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

（二）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的重要内容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但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完善，在不断挖掘实践效能中求发展。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能巩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在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时，能以内部稳定应对外部冲击。此外，国内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也导致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人民在追求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更注重政治表达。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能深化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的团结作用，更好地凝聚各方力量。

（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

根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在各级政协换届时，对于党外代表人士在各级政协中的比例有明确规定，从而确保党外代表人士能够持续、广泛、深入地参与国家治理。与此相对，西方政党制度的“选票民主”主要围绕选举展开，往往面临选民参与度不高、选举结果难以反映人民真实意愿的问题，且选举易受资本和利益集团的操纵和干扰，选举结束后选民陷入沉寂，难以参与决策后的国家治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设计，不仅关注决策过程，更强调人民在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参与和权利保障。

在价值追求上，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

都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为共同的目标奋斗。在“领导—合作”“执政—参政”的模式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集中领导和发扬民主、有序参与和高效治理的有机统一，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助于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在制度设计上，新型政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党关系层面的基本制度安排。这一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统一战线的政治逻辑，有助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和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在实践运作中，新型政党制度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等形式，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点和优势。

（四）参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要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都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参政党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建设与制度效能的提升密切相关。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的提升，意味着这一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为参政党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履职平台。在这样的背景下，参政党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有更多的机会发挥其智慧和力量，这也促使参政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适应更高层次的政治要求和社会期望。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的价值意蕴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主要不在于它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是竞争性还是合作性，更不在于自我感觉和标榜，而在于它在社会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实际作用和制度效能。”^[6]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协力攻坚克难、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和专项民主监督方面展现出强大效能，体现出重要价值。

（一）在协力攻坚中发挥整体作用

我国的民族众多、地域辽阔且人口庞大，这样特殊的国情带来了多元的文化资源、多样的物

质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但同样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情况复杂、难度较高。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专长，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发挥其联系广泛的优势，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一是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中协力攻坚。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更加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社会矛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7]。发展壮大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整体的力量“拧成一股绳”，下好“全国一盘棋”。在应对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突发自然灾害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始终同心协力，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各民主党派成员积极响应号召，投身疫情防控一线、捐赠抗疫物资，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又如，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地区出现强降雨，房山地区受灾严重。从募集资金、采购物资到为受灾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在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到处可见民主党派成员的身影。各民主党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出策献力。近年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民主党派围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积极建言献策。民建作为以经济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党派，多次就金融监管、风险防控等问题开展调研，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民盟发挥教育科技界优势，围绕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防控提出政策建议；致公党通过侨海资源，协助国家了解国际金融动态，为防范外部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协力攻坚。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客观上加大了

城镇青年的就业压力。面对城镇青年就业问题，民建和工商联提出“广开就业门路，培育就业能力”的提案，建议通过创办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为扩大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推动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提升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我国启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在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和支持863计划的推进，与中国共产党同心聚智。例如，民盟中央原主席、著名物理学家丁石孙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推动了高校科研与863计划的深度融合，培养了一大批高科技人才。又如，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选，作为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开创者，其研究成果为863计划中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是在推动区域发展中协力攻坚。毕节市是贵州省乃至全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之一。近年来，毕节在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2023年7月，中央统战部印发了《关于统一战线“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的工作方案》，不断完善推进毕节市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助力攻坚，“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取得明显成效。在“地域”帮扶上，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与全国工商联对口帮扶毕节的8个县市；在“领域”帮扶上，各民主党派中央聚焦科技、产业、教育、健康和人才五大领域，以各自所长将帮扶活动拓展到毕节全市。面对毕节市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问题，民进中央发挥智力优势，助力产业升级，牵头开展产业领域帮扶，组织专家学者建言献策，鼓励会员企业在毕节市投资兴业；台盟中央聚焦教育领域，开展“筑梦师者”培训项目，10年间为赫章县举办培训班37期，积极协助赫章县培育高水平教师队伍^[8]；农工党中央确立“助力毕节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帮扶目标，13个农工党省级组织同毕节市各县（区、市）建立

结对帮扶关系，聚焦健康医疗领域，助力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和医疗人才培养。

（二）在民主协商中促进科学民主决策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政治协商贯穿了决策的全过程，以协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在决策前，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协商议题，并搭建各种形式的协商平台，包括但不限于专题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等，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供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渠道。例如，2024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年经济形势和来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9]。在决策中，执政党充分发扬民主。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对决策方案进行深入的讨论，中国共产党在协商中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鼓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协商形成共识来减少决策过程中的阻力和矛盾，提高决策的执行效率。在决策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反馈。由此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促进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优势，并证明了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通过协商与合作实现共赢，远比简单的竞争与对立更为有效，也更能体现人民民主的真谛。

科学民主的决策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前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有效促进了多元利益诉求的整合与表达，为各类政治力量提供了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广阔舞台，保障了人民享有真切、广泛的民主权利。反观西方政党制度，其往往将民主局限于竞争性选举的狭隘框架内，并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衍生出金钱腐蚀政治、精英垄断决策、身份固化以及政治极化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民众的政治

参与常常陷入“选举狂欢后的沉默”，选举时的承诺难以兑现，人民的真实意愿难以持续影响政策走向，民主的实践大打折扣。

（三）在专项监督中拓展民主监督新路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想要做到长期执政，不仅需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更需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作为执政党，要“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健全会议监督、完善书面监督、推进专项监督、开展检查监督、做好特约监督”^[10]。专项民主监督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受党委委托就国家有关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执行和实施情况进行民主监督。2016年，中共中央委托8个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全国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8个中西部省区，列出开展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重点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开展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既是多年来第一次对专项工作进行监督，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民主监督效能的有益探索。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这项战略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1]。长江流域涉及面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为此，2021年6月，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共同牵头，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为期5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民主监督。在这项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参政党优势，围绕对口省份长江流域的生态重点工作进行深入调研，有效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和改进。无论是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还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监督过程中既坚持原则又注重合作，既提出问题又重视解决问题，形成了良性互

动的监督机制，专项民主监督不仅拓宽了民主监督的渠道、创新了监督方式，也增强了民主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的发挥路径

（一）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引领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的发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发挥的政治保障，没有坚强的政治核心，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难以发挥作用。一是通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思想共识。中国共产党应继续支持各民主党派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学习中共党史、统一战线史。各民主党派可依托多党合作历史，通过各种方式形成可视化精神图谱，使成员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全局观。二是通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正确政治方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革命中经过反复比较和权衡后做出的郑重选择。”^[12]可以说，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完善和发展。要进一步完善新型政党制度，使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多实践效能，就必须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政治方向和重大原则问题上加强引领，“加强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管理，重点了解掌握其政治表现、思想状况、履行职责、廉洁自律和个人重要事项变化情况，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态度”^[13]。三是通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强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以改革释放发展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民主党派作为执政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要协助执政党“掌舵”，共同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划桨”，

在履职尽责过程中推动决策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

(二) 以完善机制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的发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积极完善知情明政机制、考察调研机制、工作联系机制、协商反馈机制，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情出力创造条件。”^[14]健全且运行流畅的机制是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的前提。一是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力量凝聚机制。各民主党派应持续加强组织建设，通过组织学习、交流研讨等方式增强成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增强社会服务意识和水平。二是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调研工作机制。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可以从外部视角审视问题，其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领域，在调研时能够获取更多元化、更全面的信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指出：“支持民主党派中央结合自身特色开展经常性考察调研。”^[15]为优化调研课题、提高调研效率，各民主党派应注重专业优势和特色，选择与其专长领域相关的课题进行调研，发挥党派在特定领域的专业优势。三是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议政建言机制。议政建言机制让各民主党派成员敢于讲真话、建诤言。一方面，要畅通信息传递渠道、丰富知情明政平台。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工作报告和社会热点问题等信息，应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在涉及财政预决算、重大项目审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社会关注度高的领域，应注重提高信息公开的质量和实效，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及时性。另一方面，要明确协商意见督办流程，提高协商反馈效率。完善意见收集、分类整理、执行监督、结果反馈的督办流程，对协商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测，确保协商意见能够顺利落地。

(三) 以加强专项民主监督助推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的发挥

专项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监督形式的重要创新，要以专业化队伍为支撑、以制度化体系为框架、以民主党派能力提升为突破，形成“主体一制度一能力”的专项民主监督促进模式，助推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转化。

专业化队伍意味着监督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能够提升监督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例如，改善生态环境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宽、范围广、内容多，是检验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综合能力和水平的试金石。在民主监督队伍成员的选拔上，应注重选拔和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明确民主监督员的选拔标准，通过公开推荐与资格审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队伍政治素质与专业能力双过硬。在强化民主监督队伍培训机制方面，应建立政协专委会对口联系制度和办理反馈机制，推进民主监督制度整体设计和衔接配套。

制度体系的系统化、规范化是民主监督常态长效的保障。一方面，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项民主监督常态化机制。从中央层面来看，专项民主监督的意义与价值已得到充分的认识，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结束后，随即启动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实现了专项民主监督的持续化^[16]。但在地方层面，仅有少部分省份或城市能将专项民主监督持续化。另一方面，完善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推进机制。在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过程中，民主党派内部要定期召开推进会，对专项监督工作的开展情况、成效和存在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民主党派作为专项民主监督的重要主体，需从三方面强化监督能力：完善内部监督制度；深化专题调研能力；构建协同监督网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同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财政部门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联席会议，将专项民主监督与群众监督、舆论监

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等相结合，形成监督合力。

（四）以发挥民主党派自身优势促进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的发挥

我国八个民主党派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是其共性；但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是每个党派的个性。以民主党派自身优势促进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效能的发挥，既能加强党派特色建设，避免趋同现象，又能推动这一制度与时俱进，向前发展。

一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是各民主党派发挥自身优势的根本遵循。各民主党派要定期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理解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基础上，鼓励各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实践，形成具有党派特色的工作方法和成果。二是赓续党派优良传统，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各民主党派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爱国、革命、奉献等优良传统，这是各民主党派的重要精神财富，也是其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基础。可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加强宣传教育等方式，传承和弘扬各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增强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将优良传统融入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对外交往等各项工作，并结合新时代的要求，不断创新和发展党派文化，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党派精神风貌。

参考文献：

- [1] 董丽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能[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23(6): 32.
- [2] 何维. 传承优良传统更好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J]. 前进论坛, 2023(5): 1.
- [3] 张毅. 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助推中国式现代化[J]. 团结, 2024(5): 23.
- [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75.
- [5]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3).
- [6] 张献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4: 210.
- [7]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N]. 人民日报, 2019-09-04(1).
- [8] 孙金诚. 筑梦十年结硕果砥砺前行再出发[N]. 人民政协报, 2024-12-13(8).
- [9] 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22-12-08(1).
- [10]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39.
- [1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2: 65.
- [12] 周洋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制度贡献[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3): 54.
- [13]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N]. 人民日报, 2021-01-06(6).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9.
- [15]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N]. 人民日报, 2015-12-11(6).
- [16] 刘超伟. 参政党开展专项民主监督难点问题与工作体制机制研究[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1): 13.

责任编辑: 王天海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意蕴、内涵要求与实践路径

洪向华 李 娜

摘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要求包括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坚持高质量发展是重要内容;必须把握好“五个关系”;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绩观科学考核,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干部,落实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

关键词:正确政绩观;价值意蕴;核心内涵;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于顺利完成“十五五”规划制定的目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意蕴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特别强调政绩观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到底意义在哪里,把这个“扣”解开,才能使党员干部真正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意蕴。

(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马克思、恩

收稿日期:2026-02-26

作者简介:洪向华,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党理论、领导科学、管理学等;李娜,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所长(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地方政策治理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及应对策略研究”(23&ZDA1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最高原则和根本内容。中国共产党宗旨的本质要求就是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转化成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人民群众的幸福来自自身利益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干事创业就是为人民出政绩，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这个使命的完成是阶梯性推进、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实干出政绩，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每一阶段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目标如果能在五年内顺利实现，就

是实现了最大的政绩。完成这些目标，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3]。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中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要求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新发展理念，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扎扎实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重大成就是广大党员干部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干出来的。这个成绩也充分说明各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在现实的工作中，我们看到一些党员干部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政绩观，主要表现为如下。

1. 快速出政绩

有的干部任职后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出政绩；有的领导干部给下属布置安排工作时，不仅有指标要求，而且要求在一个很短的周期内就要看到某项工作取得成效，对于在预定的时间周期内完不成指标，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有的地方提出“开局就冲刺、起步就决战”的励志口号，导致有的干部“撒丫子”快跑，铆足劲儿就想“快”，为了快速出政绩，他们不惜“内卷式竞争”，造成了不利影响。

2. 热衷追求显绩

一些干部只喜欢干那种能够引起上级关注的事，上级不关注就不热心，甚至漠视人民群众的关切。有的干部干工作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有的干部做工作唯 GDP，圈地造城，盲目建新区、搞广场、树地标。有的干部搞重复建设，引进项目不管生态环保、不顾群众意愿。有的新官不理旧事，不能一张蓝图绘到底。有的干部摆花架子、喊空口号，热衷于造“典型”、搞“盆景”、出“经

验”。有的干部在工作中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把安排领导出场讲话、组织发新闻作为头等大事，最后工作却不了了之。有的干部在项目建设中号称“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热衷于签约仪式、开工仪式、投产仪式，大肆宣传，却对项目最终是否产生了效益不关心。

3. 加码出政绩

有的干部在工作中喜欢层层加码，认为层层加码就能增加政绩。他们在执行上级任务的过程中，会逐级提高任务的标准、要求、责任，有时也会超越客观实际，不顾时间、资源等限制，给基层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这种层层加码做法，是为了表明自己对上级决策的坚决执行，但实际上加重了基层负担，也不利于决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

4. 造假出政绩

有的干部相信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在工作中不能履职尽责，反而伪造虚假数据，欺骗组织，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例如，有的地方不顾当地实际规划建设相关产业园，夸大数据，虚报产值；有的地方花费高额费用向某榜单评价机构购买咨询服务，该机构帮助其实现榜单进位；有的地方相关部门在引进省外资金工作中设置不合理考核指标，基层为完成任务进行统计数据造假。这些造假或许会一时达到造假者提拔升迁的目的，但最终会被发现，对造假者而言，得不偿失。

5. “甩锅”出政绩

有的干部在工作中揽功推过，把功劳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把过错甩给别人，认为这样就能出政绩。过错甩给别人包括几类：有的甩给上级，认为应该“经常请示上级”，工作推不动，就请上级支持，自己不思考难题的破解之道；有的甩给下级，只负责布置任务，检查验收，而不给下级提供政策、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支持；有的甩给其他部门或单位，认为这不是自己的工作，推诿扯皮，导致许多工作开展不下去。在这些不正确的政绩观影响下，有的地方或部门出现了“政绩

工程”“面子工程”，严重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必须纠正这些错误的政绩观，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扎扎实实地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很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

（一）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4]从中可以看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要求。

坚持为人民出政绩就是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来自基层实践、关乎民生福祉底线，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民生领域的具体投射。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公共服务供给短板等多重因素交织，使得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新特征，解决难度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用心”“用情”“用力”蕴含着丰富的治理哲学与实践方法论，三者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彰显为民态度、传递沟通温度、体现攻坚力度，共同构成了新时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践逻辑。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以实干为要，自觉按规律办事。一是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真正把实际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规律探明。对于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必须建立在扎实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二是将尊重规律、科学决策的要求融入制度设计。健全重大决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强化决策程序的规范性、透明度和责任追溯。特别是要改革和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坚决破除“唯

GDP”倾向，更加注重考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民生改善和生态保护的实效、创新驱动和风险防范的能力，树立起鼓励实干、注重长远的鲜明导向，从制度上抑制违背规律的冲动。三是必须深刻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有其自身的节奏和阶段。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把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二）坚持高质量发展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5]。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的关键之举。

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发展的目标、重点、步骤、阶段等做好顶层设计，在绵绵发力、春雷化雨中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其次，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不断增强发展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支撑。再次，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因此，要发挥中国共产党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区合作中整合各行业、各领域、各部门的优势，确保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决策都能得到有效贯彻与落实。最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还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在保障公平、正义、平等的基础上建强廉洁高效、欣欣向荣的政党肌体，确保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保障人民幸福安康为最终目的。在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中，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是评价高质量发展成效的最高标尺。首先，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与首创精神，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

积极性、创造性，切实将人民群众的个体力量凝聚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整体动力，紧紧依靠人民推动高质量发展。其次，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群众的一切现代化实践活动目的与动因都鲜明地指向满足自身需要。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为内核，努力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使人民群众在物质与精神上得到满足。最后，要将人民评价作为发展成效的标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需要为根本动因和逻辑起点，这便决定了人民享有检验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合理权利，因此，要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尊重群众意见，切实让人民群众全过程参与发展。

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必由之路。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战略引领上要从创新驱动迈向创新引领，逐步改变外循环主导下过度注重开放式创新而忽视内生性创新能力建设的境况，构建面向本土的创新体制机制，为要素变革与产业升级转型创造条件。在创新主体上，要构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城乡一体化”多维融通的共生型创新共同体，聚焦产业链共同面临的关键核心技术难点，努力破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在创新方式上，要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深度赋能效应与生产效应，为企业技术合作、产学研合作提供技术与媒介支撑，并形成跨场域、跨时空、跨单元搜索、学习、整合的数字网络，为知识学习提供赋能工具。在政策保障上，要着眼于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构建与完善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政策体系，为实现从技术追赶、技术并跑到技术引领的全新目标保驾护航。

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奇迹，就必须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置于实体经济之上，聚焦发展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制造业，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同时，还要着眼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农村还存在发展动力不足、高效组织缺失，以及农民主体弱化等现实困境。要解决这种困境，必须切实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同时，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将集体经济楔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在分散生产与统一经营中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农业生产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格局，在持续发展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与城乡均衡发展。

（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须把握好“五个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6]。这五个关系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正确处理这五个关系，就是要在具体行动中，真正做到以正确的政绩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稳”和“进”是事物两种状态的辩证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领导干部既要争做稳经济、稳大局的得力干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又要激发“进”的动能，找准“进”的切入口，以高标准、高质量的“进”来确保实现“稳”。

处理好“立”和“破”的关系。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破除“唯GDP论”，把重质量、重效益的导向立起来，破除供需结构性失衡，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立起来，破除陈旧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

处理好“虚”和“实”的关系。领导干部要坚持虚中求实，坚持既仰望星空又脚踩大地，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任务真抓实干，以实事求是的作风从事调查研究，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以重实际、求实效的务实

之风创造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伟业。

处理好“标”和“本”的关系。领导干部要提升政治定力、保持头脑清醒、把握发展大势，练就一双政治慧眼，善于从全局和长远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做到判断上识标知本、谋划上盯标瞄本、评价上观标察本，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处理好“近”和“远”的关系。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从长远出发，多做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工作。在实现当前利益时，不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在实现长远利益时，不能好高骛远、纸上谈兵。干事创业既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也要使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四）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抓落实“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7]。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

要在求真务实中筑牢政绩根基。真抓的实劲，核心是一个“实”字，要义是摒弃虚功、务求实效，这是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前提，更是完成“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迈向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坚实基础。如果说正确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指南针”，那真抓的实劲就是校准方向的“标尺”，标尺偏一寸，行动就会歪一尺，最终的政绩自然会偏离为民初心，也会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

要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担当本色。敢抓的狠劲，核心是一个“敢”字，要义是直面矛盾、动真碰硬，这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担当。“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深化改革等核心任务，面对发展中的卡点堵点、风险挑战，唯有拿出敢抓的狠劲，才能破难题、开新局，把

战略任务转化为实干实绩。

要在科学施策中提升落实效能。善抓的巧劲，核心是一个“巧”字，要义是科学施策、精准发力。这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能力体现，更是提升落实质效、推进“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培育、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复杂任务，光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不够，更需善抓的巧劲，用科学方法破难题、以精准举措提效能，方能把“十五五”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绩。

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必须多措并举，使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勠力同心、砥砺前行，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一）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一大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使全党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政治锻炼、党性锤炼和实践历练，在思想上更加统一、在政治上更加团结、在作风上更加务实、在行动上更加一致。要借鉴这些学习教育活动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让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系列重要论述、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学习教育的总要求、目标和任务，加强调查研究，努力改进作风，引导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取得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检验的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时，要注意发挥正面榜样激励作用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在领导干部中有很多好的榜样，他们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践行初心和使命，以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解一方之困扰，促一地之发展。在中央党校的校园里有两个县委书记的雕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焦裕禄、谷文昌两位县委书记，他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事迹持续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有正面榜样也会有反面的典型案例。2026年1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地方和部门政绩观存在偏差，为追求虚名、完成脱离实际的考核指标，不惜重金买榜、弄虚作假，加重基层负担，造成不良影响。要开展案例警示教育，使领导干部紧密联系实际，深入剖析反面案例，筑牢思想防线，避免错误政绩观贻误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件再次发生。

（二）加强政绩观科学考核

干部政绩考核是检验政绩观、引领干事导向、推动事业发展的“风向标”。要围绕高质量发展，聚焦“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精准考核，这样才能发挥政绩考核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

紧扣“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优化考核方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肩负着衔接发展历程、筑牢现代化根基的重要使命。《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8]一方面，要牢牢把握规划确立的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等根本遵循，动态调整考核体系的核心维度：坚决摒弃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符的过时指标，重点增设科技创新突破、产业升级成效、民生福祉改善、绿色低碳发展等契合规划目标的考核内容，让考核标尺精准对接发展任务。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事择人、以岗定考”的核心原则，结合不

同岗位的职能定位优化考核导向，避免“一刀切”评价，引导干部立足岗位专长聚焦中心任务，把心思精力集中到落实“十五五”部署、破解发展难题上，形成“考核靶向精准、干部履职有力”的良性循环。

围绕高质量发展设置引领性考核指标。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应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设置引领性指标需突出新发展理念导向，全面覆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避免片面以经济增速论英雄。创新发展方面，设置科创投入、成果转化等指标；协调发展方面，关注区域城乡融合、产业协调等；绿色发展方面，设定能耗下降、减污降碳等约束性指标；开放发展方面，考核对外开放水平、招商质量等；共享发展方面，聚焦民生支出、居民收入增长等，引导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同时，要强化指标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坚持定性与定量、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既设置反映总体要求的共性指标，也结合地区部门实际设置特色指标。

（三）在实践中推动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9]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的环节是在实践中让干部得到历练，使其不断提升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围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检验干部实干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10]要引导干部紧紧围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开展工作，建立民生实事台账，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实行“销号管理”，将问题解决成效纳入干部考核，确保考核指标真正

反映群众诉求，推动干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围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急难险重任务检验干部的实干表现。首要在于精准锚定考核场景与核心指标。考核范围应紧扣重大突发事件处置、重大项目攻坚、改革深水区突破、乡村振兴硬骨头等关键领域，重点考察干部在这些场景中的应急决断能力、攻坚突破本领和责任担当意识。例如，突发事件中看应急统筹是否高效、群众转移是否周全，重大项目里看难题破解是否有力、推进质效是否过硬，改革攻坚中看创新举措是否务实、发展成效是否惠民，让考核精准对接实际需求。

（四）落实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

要构建引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激励机制。对真抓实干、实绩突出的干部给予全方位激励。在政治上给予关心，加大从基层一线、艰苦岗位中选拔干部的力度，让有为者有位；在工作上给予支持，为干部干事创业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和工作条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待遇上给予保障，落实好干部工资福利、医疗保障、住房待遇等政策，让干部安心工作；在精神上给予鼓励，通过表彰奖励、宣传报道等方式，增强干部的荣誉感和获得感，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要完善容错纠错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的干部撑腰鼓劲。明确容错情形，对干部在改革创新、推动发展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只要符合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没有谋取私利，就予以容错免责。规范容错程序，建立容错纠错申请、核查、认定、反馈等环节的工作机制，确保容错纠错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健全纠错机制，对容错的干部，及时指出问题所在，帮助分析原因、总结教训，督促整改落实，使他们避免再犯类似错误。同时，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正名，营造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 [1][9]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64.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1.
- [3][8]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4、69.
- [4]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N]. 人民日报，2026-01-21(1).
- [5] 习近平. 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J]. 求是，2024(12)：13.
- [6]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祖国欣欣向荣 [N]. 人民日报，2020-01-22(1).
-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情况为主题进行对照检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2017-12-27(1).
- [10] 习近平.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J]. 求是，2024(7)：9.

责任编辑：张丽

扣好“第一粒扣子”： 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进路

柴 奕

摘 要:新时代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青年干部“早节失守”问题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新痛点。在依靠制度约束的同时,亟须从源头培育青年干部“不想腐”的思想自觉。系统而有效的廉洁文化教育显得十分重要,其作用机理体现在三重功能的协同。一是系统阐释廉洁文化思想内核,助力青年干部构建“何为廉”的认知图景;二是依托革命文化资源与身边典型榜样,激发情感共鸣以确立“为何廉”的价值认同;三是推动制度规范内化为行为遵循,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引导“如何廉”的行动自觉。基于此,持续推进新时代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需牢固树立为民用权的权力观念、激活清正务实的优良作风、涵养崇尚廉洁的政治生态。

关键词:青年干部;廉洁文化;干部教育;反腐败

青年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扣好青年干部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紧扣的是政治认知的根,铸就的是廉洁人格的魂,这是破解青年干部“早节失守”风险的重要抓手,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1]。廉洁文化正是青年干部淬炼党性的精神密码,通过深厚的理论底蕴、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强大的实践功能,引导青年干部汲取廉善智慧、传承为民情怀、强化担当精神。通过接受系统深入的廉洁文化教

育,青年干部将廉洁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能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保持清醒头脑,守住“第一次”、管住“每一次”,又能在成长成才的道路上厚植“不想腐”的思想根基,最终成长为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问题出场:青年干部“早节失守”现象解析

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得到全面巩固。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

收稿日期:2025-12-18

作者简介:柴奕,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长效机制建设研究”(25CDJ0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务仍然艰巨繁重”^[2]。近年来，一些违纪违法案例清晰地呈现出腐败现象趋于“年龄轻、职级低、数额大、手段新”等特征，深刻揭示了青年干部在成长成才过程中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客观而言，腐败的发生与干部的年龄并无必然关联。然而，青年干部群体中出现的腐败行为存在代际传递的风险，他们正处于政治身份的初始建构期，一旦“第一粒扣子”扣错，不仅会中断个人的政治生命，更会污染干部队伍的源头活水，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破坏。

青年干部“早节失守”问题已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精准把握了青年干部廉洁风险这一核心议题。有学者关注到青年干部的成长轨迹，指出当前许多青年干部属于“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3]，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活跃，勇于创新，为干部队伍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但相对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4]。因此，当一些青年干部首次面对利益诱惑时，往往由于政治定力不足、价值判断偏差而陷入腐败深渊。更有甚者，一些青年干部将个人成长寄望于“关系网”和“朋友圈”，把正常的人际交往演变为利益交换的手段，最终陷入“人情围猎”的陷阱。这种价值观的扭曲，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过去一段时间的廉政教育普遍重视‘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而忽略了处于普通岗位的年轻干部”^[5]。如何明确青年干部成长道路上的廉洁风险点及防治对策，提升他们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已成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必须解答的重大课题。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深入剖析青年干部“早节失守”的生成逻辑及其背后成因，是精准识别问题的前提。从个体层面来看，价值认知的偏移与实践经验的匮乏是青年干部“早节失守”的重要诱因。部分青年干部因理想信念根基薄弱，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未能构建起稳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将个

人私欲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尤其是一些青年干部缺乏艰苦环境的磨砺，对基层群众疾苦缺乏深刻体会，对权力来源与本质的认知趋于模糊，从而逐渐迷失自我，从细微的“小错”滑向严重的“大患”。就社会环境层面而言，不良政治文化与网络亚文化的双重影响侵蚀了青年干部的价值塑造。一方面，现实中仍潜藏的“关系学”“厚黑学”等庸俗腐朽政治文化，使部分青年干部将“升官发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错误观念奉为做官哲学，在内心深处滋生了腐败的种子。另一方面，伴随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干部，其工作与生活方式已深度嵌入网络空间，网络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以及隐蔽性极强的新型腐败手段，直接对其廉洁自律意识形成强烈冲击。观察日常生活场域可见，家庭与社会交往中的隐性渗透同样构成不可忽视的助推因素。“官本位”等观念通过耳濡目染逐渐内化，“酒桌文化”等习以为常的社交模式不断模糊公私边界，这些因素如同温水煮青蛙般逐步消解青年干部的廉洁防线，成为一些人滑向腐败的“助推器”。总体而言，青年干部“早节失守”本质上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复杂结果，但其根源仍在于个体思想防线的逐步瓦解与价值立场的根本性动摇，在“不敢腐”“不能腐”机制日益完善的背景下，“不想腐”的内生动力不足是核心症结。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这一传统吏治箴言精准揭示了“干部廉洁”与“政权长治”的内在关联，为新时代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提供了宝贵的镜鉴。全面从严治党重在治吏。要实现党的事业持久发展，必须依靠一代又一代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接续奋斗。党的干部队伍中，既需经验丰富的“压舱石”，亦需充满活力的“生力军”。青年干部是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的新生力量，肩负着传承初心、开辟未来的历史使命，是党的事业发展的未来主力。青年干部守好“廉洁关”，不仅关系个人政治生涯的发展，还影响党和国家

事业的兴衰，更关乎党执政根基的稳固。因此，反腐败斗争不能忽视青年干部，应防患于未然，在青年干部价值观定型的关键期打好清廉底色，确保青年干部从一开始就形成“不想腐”的思想自觉，顺利成长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质言之，加强新时代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通过有效的文化浸润，将外在的廉洁要求转化为干部内在的、稳定的价值认同与行为习惯，既是防范青年干部“早节失守”的现实需要，更是保障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选择。唯有让青年干部在政治起点就扣好为官从政的“第一粒扣子”，将崇廉拒腐的种子深植思想深处，才能实现干部队伍纯洁性的代际传承，最终达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目标，确保党的事业在青年接棒中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二、作用机理：廉洁文化教育锻造青年干部政治品格的三重功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提醒我们，面对青年干部“早节失守”的现象，单纯依赖事后惩处的被动应对难以彻底根除腐败土壤，必须重视廉洁素养的主动培育，从思想源头为青年干部的政治成长构筑坚固防线。干部教育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具有引领性、贯通性、支配性的作用”^[6]。对于正处于“拔节育穗期”的青年干部而言，教育对其政治品格的形成更具决定性。文化作为非强制性的社会规范系统，以其特有的“柔性约束”力量突破制度惩戒的边界限制，能够直抵思想根源、填补价值空白，是影响社会行为最深层的精神力量。这种“以文化人”的独特功能赋予了廉洁文化教育在干部教育中的不可替代性。廉洁文化教育并非简单灌输，而是一个通过文化符号和价值叙事，持续作用于青年干部心理与行为的连续过程，帮助青年干部破解“何为廉”“为何廉”“如何廉”的思想迷雾，实现从个体认知到情感共鸣再到行为选择的三重升华。

（一）廉洁文化教育能够为青年干部厘清廉洁从政的思想内涵，构建“何为廉”的认知图景

在我国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廉洁并非孤立的道德标签，而是与政治目标、价值追求深度绑定的系统性观念，并始终是政治生态的生命线。《周礼》以“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构建了吏治考核体系，《官箴》开篇即有“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的治理智慧。由此可见，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鲜明价值取向。在党的话语体系中，廉洁升华为党的纪律规矩的刚性约束，更是党员干部政治品格的核心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7]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廉洁是检验党性强弱、对党忠诚的试金石，一头连着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基因，一头系着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廉洁文化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又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然而，青年干部对“廉洁”的认知却容易陷入文本表层的困境。他们或许能背诵“六廉”的内容，却难以将“廉善”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关联；熟悉《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条文，却对日常审批中微权力异化风险缺乏警觉；自认初入仕途无贪腐空间，便放松对“廉”的持续坚守。这种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的断裂、制度要求与行为指引的脱节，正是当代青年干部廉洁素养培育的瓶颈。

青年干部对“廉”的困惑，本质上是抽象的廉洁价值未能锚定具体的履职场景，导致认知仅停留在对条文的记忆，却难以对接背后的逻辑。廉洁文化教育的破题之道，在于通过文化根脉与政党理论的双向赋能，为“廉洁从政”构建更具解释力与穿透力的思想认知体系。廉洁文化教育能够以情境化认知为抓手，通过廉洁理念的具象转化，打通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壁垒。这种具象转化并非简单的“讲案例、说故事”，而是立足执政伦理的实践指向性，将廉洁的核心要义还原到青年干部为官从政的具体场域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对接。例如，将“廉善”的传统智慧与“拒

绝亲属承包项目”的具体案例相结合，使青年干部明白“廉善”的本质是“以民为本”，当亲属的项目诉求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坚守廉洁底线即守护公权的人民性，这并非“不通人情”的选择。这种将传统理念、当代场景与理论内核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既传承了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中“公权为民”的精神根脉，又精准回应了青年干部履职中的真实问题。它使青年干部在处理具体事务、作出关键决策时真正理解到：廉洁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作为公共权力使用者身份的必然要求。通过系统的廉洁文化教育，青年干部能够在为官从政的初始阶段即形成对廉洁从政的清晰概念认知与理论自信，从源头上筑牢预防“早节失守”的理论防线，在面对现实诱惑时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与坚定的认知立场。

（二）廉洁文化教育能够激发青年干部崇廉尚洁的政治情感，确立“为何廉”的价值信仰

政治情感是政治认同的深层心理根基，也是青年干部廉洁理念从外在行为规范向内在价值自觉转化的核心媒介。青年干部对廉洁的价值认同，不仅需要“是什么”的理性认知，更依赖于“是否共鸣”的情感联结。缺乏情感联结的理性认知，往往容易沦为机械遵守规则的被动服从，使“廉洁”异化为缺乏温度的任务式要求。中国的“民为邦本”政治传统天然将廉洁与公权为民的伦理内核相关联，将廉洁从个体道德上升为政治伦理。中国共产党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将权力合法性锚定于民生福祉，这使得中国的廉政建设超越“反腐防腐”的底线要求，指向“崇廉尚洁”的价值升华。

党的廉政建设更强调通过情感共鸣与价值传承实现内在约束，廉洁文化教育对于青年干部崇廉尚洁政治情感的涵养，其核心逻辑正在于依托文化的感召性，唤醒青年干部对廉洁价值观的深层认同。革命先烈的廉洁实践，堪称最鲜活的情感原型。例如，年仅36岁的方志敏在狱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

许多困难的地方！”^[8]这种以生命践行的“清贫”精神可将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赤子之心凝结为可感知的历史记忆，为成长于和平年代、缺乏革命斗争淬炼的“90后”“00后”青年干部提供历史回望中的情感锚点。这些青春故事能够让青年干部直观感受到，廉洁并非外在于自身的约束，而是对“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初心的传承。除了革命先烈的事例，新时代优秀党员干部在平凡岗位上的廉洁事迹同样是触手可及的情感榜样。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岗位上用一言一行诠释着廉洁的真谛。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能够让青年干部在共情中体会到廉洁是融入日常工作的行为准则，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具体体现。挖掘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含的廉洁基因，使之与青年干部内心深处对公平正义、责任担当的向往相呼应，使他们在情感上主动向廉洁价值靠拢。当青年干部从革命先辈的赤诚、身边榜样的坚守中感受到廉洁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人格尊严时，崇廉尚洁便不再是被动遵守的纪律要求，而是内化为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他们在面对各种诱惑时，能够生发出“不想腐”的情感自觉，这为确立“为何廉”的价值信仰奠定坚实的情感基础。

（三）廉洁文化教育能够筑牢青年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指引“如何廉”的行为自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深度调整、利益格局深刻变动、思想观念多元碰撞的转型关键期，已无绝对意义上的“世外桃源”存在。“四种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叠加“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持续向全面从严治党发出警示，执政党的建设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纵深推进，容不得半刻松懈。锚定反腐败斗争“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基本方针，在持续强化惩治震慑的外在压力、完善制度约束的刚性规制基础上，更需高度重视廉洁文化教育对遏制腐败的“釜底抽薪”作用。相较于“不敢腐”依赖外部惩戒形成的行为抑制，“不能腐”依托制度设计构建的

机制屏障，“不想腐”所培育的思想自觉，实则是从价值根源上切断腐败滋生链条的核心要件。心中无戒尺，焉能不迷失？一些青年干部滑向贪腐深渊的关键诱因，恰恰在于纪律意识的薄弱与规矩认知的虚化。当廉洁文化的浸润未能穿透认知表层、内化为稳定的价值认同，其行为实践就容易偏离正轨。因此，对身处事业上升期却面临更高诱惑风险的青年干部而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本质上是一场“思想保卫战”，这一战役的关键，在于以廉洁文化为精神纽带，打通拒腐防变的价值共识从“认知认同”到“行为实践”的“最后一公里”，最终达成“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的行为自觉。

廉洁文化教育具有弥合“认知认同”与“行为实践”内在张力的功能，通过将纪律要求转化为适配青年干部履职场景的行为指南，为其日常用权锚定清晰的意义坐标与实践框架。具体而言，一方面，廉洁文化教育以顶层制度的场景化语义转换为核心，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顶层制度设计的原则性规定，具象为“廉洁从政”“公私分明”等可操作的履职规范。同时，通过情景模拟、错题复盘等常态化廉政培训，让青年干部在节日礼品馈赠、企业请托关照等模拟情境中掌握回应方法，规避因规则认知模糊而导致的履职偏差。另一方面，廉洁文化教育善于激活家庭助廉与社会监督的协同效应。组织层面通过廉政档案动态管理、履职风险评估等机制，将制度约束嵌入青年干部日常履职全流程；家庭场域以家风建设为中介，借助廉政家访、家属助廉承诺等形式，将廉洁要求纳入家庭伦理的代际传递；社会维度依托政务信息公开、廉政举报等形成外部监督机制。这些将青年干部履职行为置于组织纪律、家庭期待与社会舆论的多重审视下，形成组织约束强化纪律意识、家庭提醒涵养廉洁自觉、社会监督压缩寻租空间的三重防护机制。概言之，廉洁文化教育将“拒腐防变”的应然要求转化为“行为自觉”的实然

状态，既消解了青年干部“规则认知模糊”的认知困境，也破解了“自律意愿不足”的自律难题。

总体而言，新时代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的功能价值，在于能够直抵“不想腐”的思想原点。它以文化浸润重构“何为廉”的认知坐标，以情感唤醒厚植“为何廉”的价值认同，以行为养成固化“如何廉”的实践自觉，将“廉”从外在规则升华为青年干部内在的精神信仰。这种信仰一旦扎根，便会成为抵御腐败的精神抗体，无须依赖外部监督，便能在权力诱惑面前自发坚守初心，在利益陷阱面前主动划清界限，真正把“不想腐”熔铸为从政的价值底色与人格自觉。青年干部唯有将廉洁内化为从政生涯的价值底色，在权力面前保持定力，在诱惑面前坚守底线，方能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最终成长为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可靠接班人。

三、实践进路：新时代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的着力方向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将廉洁文化建设纳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并将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定位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9]。这一系列的决策部署为新时代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搭建了制度框架，锚定了实践方向。

新时代的廉洁文化教育需以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为基石、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以时代特征为坐标，在历史传承与现实关照中推进廉洁文化教育。具体而言，新时代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要聚焦三个维度着力：以理论武装校准权力认知，以作风锤炼筑牢行为规范，以生态营造涵养崇廉风尚，最终实现教育引导与青年干部廉洁素养提升的协同共进。

（一）有效清除腐败“亚文化”，牢固树立为民用权的权力观念

权力观是青年干部政治认知与实践行动的“总开关”，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政绩观与事业观的价值导向，更关乎党在群众中的信任根基。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10]这一论述为青年干部理解权力的来源与用途提供了根本遵循，也凸显了在实践中校准权力观的紧迫性。当前社会，不乏一些偏离主流廉洁价值观的“亚文化”或“潜规则”，它们是腐蚀青年干部思想、扭曲其权力认知的直接文化诱因。若不能有效清除这些既存的腐败文化，任何正面的廉洁文化建设都可能沦为“空中楼阁”。因此，首要任务是以“刀刀向内”的勇气，精准识别并铲除腐败“亚文化”，牢固树立为民用权的权力观念。

权力因由民所赋而具有公共性，但权力本身具有内在的扩张性与腐蚀性，运用得当可惠及民生，失范滥用则损害群众利益。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决不罢休。”^[11]权力的“双刃剑”效应造成党的干部群体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权力观，塑造出截然不同的行为取向。正确的权力观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核心要义，强调将初心使命转化为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践，这是干部队伍的主流价值导向。错误的权力观则扭曲权力本质，滋生“官本位”思想，表现为“重显绩轻潜绩、重形式轻实效”的功利倾向，集中暴露了对权力人民性根源的背离。官僚主义“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12]的做派，正是错误权力观的典型表征。青年干部正处于职业生涯起始的关键阶段，一些人缺乏对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行使的深刻认知，若不能及时校准权力观，极易陷入“权力是个人资本”的认知偏差。只有将权力认知扎根于“为民”初心，才能确保青年干部在履职初期就锚定正确方向，避免因认知偏差滑向权力异化的深渊。

廉洁文化教育对青年干部权力观的校准，实质上是一场涵盖认知与实践的双重塑造过程，核心在于通过“正反结合”的方式构建深层认同。一方面，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智慧、革命先辈“权为民役”的典范事迹，以及新时代党员干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鲜活实践，为青年干部树立“权力姓公不姓私”的正面价值坐标，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将“为民谋利”内化为行动自觉。另一方面，依托系统性警示教育，深度剖析年轻干部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尤其针对“重显绩轻潜绩”“重形式轻实效”等功利化倾向，以“小错酿大患”的轨迹揭示权力失控的现实危害，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使其直观感受权力滥用对个人前途、家庭幸福与群众信任的毁灭性冲击。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校准青年干部权力观需处理好两对关键关系：一是公与私的关系；二是个人发展与党的事业的关系。就公与私的关系而言，可以通过弘扬无私奉献、克己奉公的崇高精神，为青年干部树立鲜明的价值标杆。青年干部通过学习革命先烈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事迹，深刻理解“公”字的千钧分量，在内心深处筑牢公私分明的思想堤坝。廉洁文化教育还可以通过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让青年干部从反面案例中汲取教训，明白权力滥用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而增强自我约束能力，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慎独慎微。这种精神熏陶与反面警示相融合、价值引领与实践体悟相结合的双向浸润模式，远比简单说教更能触及灵魂，助力青年干部在明晰是非边界中筑牢“权为民所用”的思想根基，最终实现权力观的深度校准。

（二）系统构建“不想腐”的预防屏障，激活清正务实的优良作风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直接体现，更是衡量党群干群关系和人心向背的关键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

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13]。这一论述将作风建设提升至与理论建设同等高度，凸显其对党的生命力的根本支撑作用。现实中，不正之风与贪污腐败往往互为表里、递进演变。不少青年干部尚未滑向贪腐深渊，但已从八小时外的违规聚餐、收受小恩小惠这类“小节”失守开始，逐步突破纪律底线。这警示我们，廉洁文化教育不能仅盯着“腐败结果”，更要关口前移、防微杜渐，从纠正作风偏差抓起，把“守作风”作为防腐败的前置防线。

激活清正务实的优良作风，关键在于构建“作风养廉、廉促作风”的双向赋能机制，让廉洁文化教育在作风实践中落地生根。党的作风建设与廉洁文化教育实践高度契合，廉洁文化是作风建设的重要资源，而作风建设则是廉洁文化教育的关键途径。作风建设注重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原则转化为行动，廉洁文化则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润塑造价值认同，二者相辅相成，让青年干部廉洁教育跳出单向灌输的窠臼，真正成为融入日常的行为自觉。例如，理论联系实际的反形式主义内核，恰是廉洁文化“务实担当”精神的实践落点，引导青年干部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远离虚浮诱惑；密切联系群众的民本导向，让“深入基层、心系民生”成为青年干部涵养初心的土壤，将廉洁文化的情感认同落到实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刀刃向内品格，则为“自省自律”的廉洁传统注入现实动力，推动青年干部在自我革命中筑牢防线。

以激活优良作风为关键开展新时代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实质上是抓住了廉洁价值从理念认同到行为转化的核心枢纽，让“守作风”成为“防腐败”的前置防线，把廉洁要求变成日常行为的自然自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需要紧扣“思想铸魂、实践淬炼、制度护航”三个关键点。一是以理论武装固本培元。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纳入青年干部培训必修内容，通过专题研讨、情景模拟等方式，讲透“八项规

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背后的政治逻辑，让青年干部从思想深处明白优良作风才是廉洁从政的“压舱石”。二是以实践淬炼砥砺品格。通过搭建“急难险重任务历练”等平台，让青年干部在服务群众最前沿体会“脚下沾泥”的分量，在解决复杂问题中锤炼“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担当，让廉洁认知在实践熔炉中升华为本能。三是以制度保障常态长效。将作风表现纳入干部廉政考评体系，建立“日常观察、群众评议、专项督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对“庸懒散”“官架子”等苗头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防止小毛病演变为大隐患。这既契合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风腐同查同治的实践要求，又直击青年干部成长中“知易行难”的实践痛点，确保优良作风伴随青年干部成长。

（三）将廉洁价值深度融入治理全流程，营造崇廉尚洁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好，党内就会正气充盈；政治生态不好，党内就会邪气横生。”^[14]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旨在营造崇廉尚洁的政治生态，回应青年干部作为“政治品格塑造关键期主体”与“政治生态重要变量”的双重定位。青年干部既是政治生态的受教者，更是政治生态的建构者。一方面，他们处于价值观与作风养成的关键阶段，政治生态的浸润式影响直接塑造其对廉洁的认知框架；另一方面，作为同龄人中的先锋群体，青年干部的廉洁行为具有显著的传播复制性，其个体实践能以微观样本撬动政治生态的建构过程。因此，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的实践指向，是通过引导青年干部成为“崇廉尚洁”的行动者，从源头为政治生态注入“不想腐”的思想动能。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需以廉洁文化为引领，推动廉洁理念深度嵌入党内政治生活与社会交往各环节，关键是构建制度规范为骨、文化浸润为脉的协同机制。制度建设层面，完善青年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细化权力运行清单与廉政风险防控，以刚性约束压缩寻租空间，促其养

成依规办事的惯性；同步建立廉洁表现动态评估与激励机制，将廉洁素养纳入考核，对廉洁自律、担当作为者给机会、强激励，树牢“廉洁受尊崇、有为有舞台”导向。文化浸润层面，需贴合青年认知特点创新传播方式，打造“线上+线下”立体化教育场景。线上可开发廉洁微视频、动漫等新媒体产品，运用学习强国、政务新媒体等平台构建“指尖上的廉洁课堂”；线下可组织廉政基地参观、庭审旁听等沉浸式体验，辅以“廉洁故事分享会”等活动，让廉洁成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元素。通过制度约束与文化滋养的双重发力，推动青年干部在浸润中增强认同、在互动中实践要求，最终促成人人思廉、全民崇廉的生态，为反腐败斗争厚植文化支撑与人才保障。

廉洁理念在青年干部群体中扎根发芽，不仅能引导他们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还能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将廉洁理念传递给更广泛的青年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以示范引领效应，激发全社会优良作风的内生动力，培育出崇廉尚德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的持续向好，不仅能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更能依托青年干部的正正品格凝聚群众共识、夯实执政根基。唯有青年干部“守得住底线、扛得起使命”，方能推动党的事业在代际传承中保持纯洁性与活力，确保“后继有人”的战略目标落地生根，也为国家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四、结语

腐败是人类社会治理的顽疾，始终是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自腐败现象产生以来，人们对贪贿危害的反思持续深化，“廉”与“贪”逐渐沉淀为截然对立的坐标。廉洁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核，其生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土壤。青年干部的廉洁素养，一头连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纯度，一头系着党的事业代际传承的厚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

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15]这一论述从人格修养与干事创业的双重维度，深刻阐明了廉洁自律对青年干部永恒价值。以廉洁文化教育为契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与党的优良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干部的日常认知，助力其在实践中锤炼品格、培养定力，增强抵制不良风气的免疫力，使青年干部不仅成为优良作风的传承者，更化身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长远观之，一支清正廉洁、作风过硬的青年干部队伍，必将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J]. 求是, 2025(23): 7.
- [2] 赵成. 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与会同志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N]. 人民日报, 2025-01-08(1).
- [3] 白广磊. 做经得起考验的新时代年轻干部——与三位优秀中青年干部关于成长的对话[J]. 中国纪检监察, 2022(8): 14.
- [4] 陆卫明, 翁诗雨. 习近平关于青年干部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03.
- [5] 陈朋. 青年干部成长中应注意的关键问题[J]. 人民论坛, 2022(Z1): 27.
- [6] 李明旭.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成审视、内在机理与实施进路[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1): 50.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48.
- [8] 方志敏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64.
- [9]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EB/OL]. (2022-02-24). https://www.ccdi.gov.cn/toutiaon/202202/t20220224_174016.html.

(下转第 61 页)

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机制研究

郭晓东

摘要: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是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中心任务。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深刻变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群体构成、思想观念、身份意识、政治参与意愿及方式持续发生系统性变化,政治引领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遵循“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统战思维,全面准确把握他们政治观念的变化趋势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进一步在协同联动、共识教育、人员培养、政治参与、方式创新方面完善政治引领机制。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统战工作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政治制度、政治道路等;同时,他们是基于自由市场和权利意识成长起来的“体制外力量”^[1],面临新与旧的身份归属、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分歧、线上与线下的行为差异等问题。这种群体特殊性意味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既可能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政治稳定的积极力量,也可能因激进的社会变革诉求而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冲突、阶层关系紧张的不稳定因素,进而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潜在风险。对此,需要遵循“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统战思维,全面准确把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者”

的政治属性、政治观念的变化趋势及其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完善政治引领机制,确保这一群体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稳定器。

一、政治引领的基本内涵

(一) 政治引领的概念

目前,一些研究把“政治引领”视同于“思想政治引领”,而在工作实践中也存在重“思想引领”、轻“政治引领”,或者以“思想引领”替代“政治引领”的问题。实际上,“政治引领”与“思想政治引领”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既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又各有侧重、各成体系。

从相关性来看,“政治引领”与“思想政治引领”都包含“引领”一词,亦即“带领、指引”

收稿日期:2026-01-30

作者简介:郭晓东,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研究方向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委托课题“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机制研究”(20250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意思,本质上都是“人的有目的的能动性实践活动”^[2],具有共同的政治主体和目标指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3]。

从差异性来看,思想政治引领的核心是“思想”,是运用科学理论、价值观念等去影响引领对象的头脑,从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形成共同的、稳定的意识,更偏向“意识层面”的引导。例如,通过理论宣传、文化教育、谈心交流等方式,让社会公众或特定群体从思想上认同并自觉追随引领者制定的共同目标。

政治引领的核心是“政治”,根本问题是公共权力,即“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利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4]。综合政治与引领的概念,政治引领可以界定为“是政治主体通过引导政治对象认同、接受、外化政治主体的政治价值观,带领他们坚持以政治价值目标实现为导向的政治实践活动”^[5],目的是引领社会公众在思想和行动上与阶级、政党所确立的政治体系、政治方向、政治道路保持一致,更偏向“实践层面”的引导。例如,通过政治教育、政治安排、政治参与等具体活动,团结带领政治引领对象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

(二) 政治引领的特征

一是引领主体的确定性。政治引领作为整合政治力量、凝聚政治共识的政治实践活动,其主体必须是,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在任何时候、任何状况下都毋庸置疑、绝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对不同社会力量的政治引领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通过各级党的组织实现的。各级党组织共同承担政治引领的主体责任。

二是引领对象的广泛性。政治引领的对象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需要团结联合的广大同盟者,其中必然包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从政治层面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根本利

益上与其他群体是一致的,同样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成为政治引领的重要对象。

三是引领内容的针对性。首先,增进政治共识,培育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国家认同感、社会责任感和民主参与意识,形成对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的普遍认同,在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整合政治力量,将大多数处于体制外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吸纳、整合到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以实施更有效的公共行动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6]。最后,引导有序政治参与,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政治活动提供制度化渠道,避免非制度化参与带来的无效乃至无序的风险。

四是引领方式的灵活性。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特殊性,政治引领方式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依据其政治需求和群体特点及时作出调整与创新,善于用他们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阐述党的主张,善于把线上互动和线下沟通结合起来,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加强政治引领力度,又让其感受到“温度”。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工作面临新变化

进入新时代,在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持续加速、网络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持续发生深刻变化,这关系到统一战线社会经济基础、工作对象范围、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深层次变化。

(一) 群体边界日益交叉模糊,成员结构持续分化,整体呈现类聚群分的松散态势

一是群体之间边界模糊化,呈现跨界、跨阶层特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固定化的社会群体,其构成处于持续变化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度融合,带来生产力要素组织方式的革命性重构和劳动关系的深层次变革,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分化和调整,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与新兴产业工人、新农民、新就业群体等群体的边界“不再是内生、稳定和僵化不变的，而是内外共生、动态和关系化的”^[7]。他们之间职业相互流动、身份相互转化、活动领域相互重叠。这一变化导致政治引领面临对象不清晰、范围不确定等难题。

二是成员构成复杂，存在弱联系状态。新技术革命催生大量新兴产业和新业态从业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构成多样、身份复杂，群体结构趋于松散化。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存在职业分工、身份地位、社会资源与影响等差异，四类群体之间关系相对疏离，对组织的认同度和归属感较低，群体整合的主观意愿和动力不足，缺少开展政治引领工作的有效抓手。

三是职业和身份流动性强，群体结构不稳定。受市场经济利益导向和竞争机制影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倾向于选择一种自我主导、自我经营、自我发展的“候鸟式”生活，职业流动性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种强流动性对政治引领工作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仅难以与其建立长期稳定的可持续的情感纽带，而且会导致统战力量和统战资源流失，加大政治引领的难度。

四是社会交往圈层化，存在内外之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社会交往上以专业性较强的“内循环”为主，基于相同或相近的职业行业、兴趣爱好以及价值理念等因素而自发结成一个个层级分明、相对独立的“小圈子”，而对非同道中人存在一定的排斥或抗拒心态。这些“小圈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够使成员内部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使他们相对容易达成共同目标、开展集体行动，但也会在圈里与圈外之间形成一道看不见但又客观存在的“玻璃幕墙”，导致一些社会组织处于分散混乱状态。

(二) 思想观念复杂多变，注重个人价值追求和高层次发展，社会心态具有明显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一是个人需求层次相对较高，群体间存在差

异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个人需求呈现出明显的个性化多层次性特征，该群体中个体的需求层次相对较高，以“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为主，且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与企业发展深度绑定，主要关注工资福利、就业渠道、社会保障等物质和安全问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面临服务公共性与组织营利性的矛盾，更加关注公共服务的价值实现与社会认同；自由职业人员面临非传统就业导致的政策适配性问题，普遍希望有稳定收入、有权益保障、有组织归属感等；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市场经营压力与舆论导向责任并存，比较重视舆论监管、流量变现等问题。这就需要在政治引领过程中，“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针对他们的不同需要制定差异化对策。

二是富有创新进取精神，存在逐利倾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创新创业意识，普遍认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追求更高层次发展，谋求创造更大社会价值。与此同时，他们又是“经济人”，受到市场思维和竞争意识的影响，存在一定逐利倾向，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一些人在经济下行、就业不稳定、收入波动较大等压力下，自认为是“脆皮青年”，存在无可奈何甚至甘愿“躺平”的心态；也有人在快速变化、不确定性增加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种种无所适从、过度反应的“躁动”现象。这些背后都隐藏着他们强烈的不安全意识 and 危机心态。

三是社会心态整体理性平和，具有强烈的公共精神。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先富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满意度和公平感普遍比较高，社会行为倾向具有明显的利他性和亲社会性。究其原因，该群体普遍具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格和情怀，具有强烈的职业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意愿比较强。同时，他们的资源优势与社会公益需求相匹配，“更有可能成为慈善公益事业的践行者和奉献者”^[8]。此外，缺少体制保障，客观上

促使他们更愿意抱团取暖，通过互帮互助互济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压力和风险。

（三）“建设者”身份意识开始生成，多为自发的应激反应，还没有完全定型

一是身份认同复杂化，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本身是一个异质性很强而认同度不高的群体”^[9]，其身份认同仍处于一种没有完全形成的动态变化之中。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身份的认知，表现为既“模糊”又“复杂”，更“多变”的初始化特征^[10]。其原因在于，身份认同并不完全取决于阶级阶层位置，它同时也受到其他身份归属因素（如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社会政治团体等）和行为实践（如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影响^[11]。

二是地位认同情绪化，心理落差比较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处于快速变动的社会结构体系之中，不同群体之间经济、社会、政治位置变化相对较快，与其心理预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他们对自身地位的认同“明显下偏且中层认同比例偏低”^[12]，甚至认为自己名义上属于“中等收入群体”或者“中间阶层”，实际上是“社会夹心层”。这种地位认同落差容易导致他们产生“相对被剥夺感”^[13]，继而可能引发对党和政府、对社会的不满或抵触情绪，甚至有可能引发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冲突。

三是利益认同碎片化，群体间差异明显。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的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长期比较短，加之群体成员之间关系复杂松散，他们关于群体利益的认知来源于自我利益保护的应激性反应，存在公与私、奉献与索取、长期与短期等差别，在政治需求和政治热情上表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例如，一些人认为自己既没有非公经济人士的高收入，也享受不到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福利，易受忽视。这种不规则的、碎片化的群体利益认知，导致一些人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不公平感，难以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利益。

（四）政治参与意愿增强，政治取向复杂化，网络化参与倾向明显

一是政治信任度比较高，存在“央强地弱”反向差序信任格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党政部门的信任度相对较高，处于“比较信任”水平。然而，他们对不同层级党政部门的信任度由中央向基层依次递减。需要注意的是，较高的政治信任度并不意味着较高的政治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其采取理性的意见表达方式却无法获得满意的结果时，可能转而采取非理性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这易成为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潜在因素。

二是政治参与意愿增强，参与动机复杂。随着财富增长和经济地位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意愿普遍增强。从政治参与的动机来看，大部分人是为了建言献策、服务社会、维护公正等利他性目的，也有少部分人是为了扩大影响、获取资源、结交人脉等利己性目的，存在投机行为。这些不良或者消极政治动机虽然只是少数或者偶然存在，但可能导致两种不利倾向：要么“无所事事”，政治参与不足；要么“无所顾忌”，无序参与。

三是政治参与行为趋于网络化，存在不均衡现象。当前，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中，还存在机制不够完善、利益表达渠道相对狭窄、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不足等问题，从而使一部分人突破现有制度规范，选择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特别是网络技术发展为该群体参与政治活动提供“机会之窗”，更多人倾向于通过网络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或意见建议。另外，他们政治参与活动存在不均衡现象，少部分知名度高、有影响的优秀代表人士占有绝大部分政治资源，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多数成员因缺少政治资源和机会而“仍处于体制边缘，被排斥在权力结构和制度场域之外”^[14]，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疏离感。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工作存在新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

作取得一系列成效，但仍然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政治引领工作有待继续破题和答题。

（一）引领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存在“统一战线不统一”问题，统战工作责任制有待进一步落实

一是对统战工作重视程度不高。有人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众多，只要抓住几个少数关键人物就可以，存在“上层抓得紧、基层落实难”现象。也有人认为统战工作是“虚”的，做不做无所谓，做多做少无所谓，做好做不好无所谓。还有人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观念复杂多变，难以找到工作抓手。在把他们组织起来方面，出于“出力不讨好，自找麻烦”“自由散漫，不好管理”等担忧，有意识地选择少组织甚至不组织。以上情形虽然只是少数，但对统战工作产生了一定消极作用，影响政治引领的实效性。

二是缺少常态化工作协调机制。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相关的部门、行业、社会组织等存在部门区隔与信息孤岛，条块结合不够紧密，统战工作覆盖领域受到限制。统战部门与其他组织机构之间横向沟通协调不够通畅，较难发挥系统集成优势。党委（党组）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走过场”“做样子”或者“应付检查”的形式主义现象，“统战工作就是统战部门工作”的工作格局并没有完全改变。

三是统战力量和资源相对薄弱。一方面，统战部门普遍面临人少事多的矛盾，编制偏少、专职化程度不高、工作本领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受活动经费不足、活动场地不固定等物质条件限制，基层统战部门统战资源有限与工作需求增加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工作难以覆盖更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二）引领内容针对性较弱，存在工学矛盾问题，政治共识教育的质效有待提升

一是培训内容重理论轻实践。一些培训习惯于一张课表用到底、一个课件讲到头，难以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培训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培

训内容偏重理论政策和会议精神解读，而对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教育，特别是对提升参政议政能力的培训相对欠缺。同时，一些培训内容存在脱离个人发展实际与履职能力之所需的问题，从而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缺乏吸引力。

二是培训方式比较单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培训大都采用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开展线下集中培训的模式。随着培训对象范围扩大和信息获取渠道改变，这种单一培训模式的不足开始显现——不仅难以开展常态化系统性教育，而且与他们的工作、生活存在时间上的冲突。另外，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的部门比较多，存在多头重复培训现象，致使他们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下降。

三是培训效果较难评估。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培训，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能够提升他们政治能力、是否能够满足他们参政议政需求，这些还缺少科学有效的评估考核机制。对培训部门而言，存在“为培训而培训”现象；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而言，缺少对政治培训目的和意义的深刻认识，缺少自我提升的内生动力。

（三）引领对象代表性不足，存在人才队伍“有高原、无高峰”问题，政治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有待提升

一是数量比较少，队伍结构不合理。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非一个特征鲜明的整体，而是内部分化和结构异质性较强的群体”^[15]，较难产生一批群众普遍认同、社会影响力和动员力强并且具有较高政治参与意愿的代表性人士。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成员，特别是组织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构成来看，中介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居多，活跃度比较高，而群体数量最多的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占比却比较低。这种行业职业差异导致他们较难形成共同的群体意识，不易开展统一的集体行动。

二是参政议政能力不足，作用不明显。一些

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虽然是各行业、各领域的精英人才，拥有比较高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由于缺少专门的政治培训和实践锻炼机会，他们在参政议政方面有时是“政治素人”，面临对上不知如何参与、对下不知代表谁参与的双重难题。

三是培育使用力度不够，缺少成长机会。一些基层党政部门还没有真正将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锻炼纳入议事日程，缺乏系统完整的考察、培养、交流、使用机制。一些政策规定缺乏刚性约束，存在重培养、轻使用现象，致使他们仍然面临“有代表无参与”或者“无代表有参与”的现实问题。

四是政治安排机会比较少。受客观条件限制，对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较少。这不仅影响该群体对当下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政治立场的选择和政治参与的态度，也导致他们因缺少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可能选择一些非正式手段或非正规机制进行利益表达。

（四）引领渠道存在局限性，存在“政治吸纳少、组织起来难”问题，制度化参与渠道有待拓展

一是现有组织吸纳不足。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对于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优秀分子都有明确制度规定，但落实中存在客观难度，实际工作推进慢。由于各种原因，人大、政协，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也未能更好地从该群体中吸纳优秀分子。

二是新建联谊组织不够成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发展周期普遍较短，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较低，组织运行效率不高。这类组织对统战部门存在依附心理，习惯于被动地、机械地依靠行政指令来开展工作，缺少独立组织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比较弱，不仅直接影响到组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且影响到统战工作的组织化水平。

三是自组织发展存在过度组织化风险。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分布在各类自组织之中。自组织基础薄弱，发展水平比较低。大量自组织处于政府监管之外，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容易陷入无序发展状态，从而成为影响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

（五）引领方式缺少创新性，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的本领有待增强

一是不善于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群体画像不够清晰，存在一定程度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策不准现象，仍然习惯于通过开会、办班、发文件等方式开展工作。这些工作方式方法往往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长需求不匹配，导致政治引领缺乏精准性而难有实效。

二是不注重走网上群众路线。一方面，部分统战工作人员的网络统战意识不强，不习惯通过网络手段收集民意、组织活动、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未能充分运用网络平台。虽然大部分统战部门已经建起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和门户网站“三微一端一平台”网络平台矩阵，并有专门的公众号或微信群，但这些网络平台的利用率不高，没有真正发挥思想引导、政策解读、风采展示、诉求反馈等新媒体作用。

四、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的机制

当前，需把完善政治引领机制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发力点和重要抓手，积极探索凝聚思想政治共识、引导有序政治参与、发挥积极政治作用的新思路、新举措。

（一）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协同联动机制，形成政治引领的合力

一是明确责任主体，加强协同联动。统战部门作为牵头单位，应当主动加强与组织、宣传、网信、民政、司法、社工等部门的常态化沟通联系。按照“重点任务大家挑，家家身上有指标”工作思路，优化完善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形成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双层组织架

构，既兼顾全面，又突出重点。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互通”的统战工作集成模式，把统战工作的“千条线”拧成“一股绳”。

二是配强工作力量，解决“本领恐慌”。选配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文化修养高、善于团结人、热心统战工作的统战干部负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把统战工作经费列入各级党委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保证必要的工作经费开支。建立统战干部队伍教育培训长效化机制，重点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和统战业务培训工作，使他们在提升政治理论素养的同时提升统战业务能力。

三是坚持党建引领，确保政治方向。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纳入各级党组织重要工作职责，做到党建工作与统战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以党建带统战、以统战促党建，确保政治引领的正确方向。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在有条件的“两新”组织中成立功能型党支部，延伸工作手臂，扩大党组织的有形覆盖，促进党建与统战工作的深度融合。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党员的先锋模范、政治引领、服务帮助等作用，提高党员的形象和认同度，实现党的组织有效覆盖。

（二）强化政治共识教育机制，优化政治引领的内容

一是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激励人。结合重大时间节点，围绕国家重点任务，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把政治引领嵌入主题教育活动之中，引导他们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生观，使他们抛弃“政策易变”的思想顾虑、消除“小富即安”的自满意识、打破“隔岸观望”的保守心态^[6]，增强责任担当意识。

二是组织培训学习，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人。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教育培训纳入党外人士培训总体计划，开展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以文化

认同教育为基础、以能力素质培养为重点的教育培训。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系统学习统战理论和相关政策；同时，注重统战教育培训与满足个人发展需求相契合。通过开展社情考察、实地调研、社会服务等方式，让他们在实践中增进对理论政策的理解，增强政治认同，提升参政议政能力。

三是做好服务帮助，以实际行动凝聚人。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政治引领与推动个人发展结合起来，构建面向整个群体的服务帮助体系。通过建立意见反映、沟通协商、帮扶纾困、互助合作等机制，力求做到既满足多数人的共同愿望，又解决少数人的合理诉求，从而以实际行动把他们的“心”聚起来，不断提升社会满意度和政治效能感。

四是善于联谊交友，以真挚情感感染人。健全领导干部与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谈心谈话、列名联系等制度，明确谁联系、联系谁、联系什么、怎么联系，及时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帮助他们打开思想堵点，使他们由“被统战”转变为“要统战”。牢记党员干部是为了党的工作去交朋友，在联谊交友中分清“公谊”与“私谊”，在扩大朋友圈时，守住底线，摒弃私心杂念，诚心实意为党交友。

（三）优化代表人士培养机制，抓住政治引领的关键

一是物色选拔，扩大优秀人才储备。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遴选，要克服“唯熟人论”“唯财富论”“唯流量论”等思想，有组织、有计划地广泛选择代表人士。针对行业领域分布差异和社会影响力不同，选拔人才要聚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中的城市和重要领域，聚焦职业经理人、律师、社会组织负责人、自由撰稿人、新媒体企业出资人、“网络大V”等重点群体，聚焦有品行、有能力的青年人才。同时，加强与主管部门、群团组织、“两新”组织、行业协会及商会的沟通联系，形成“协会组织推荐、主管部门筛选、统战部门把关”的人才选拔模式。

二是提质培优，注重政治能力培养。坚持代表性与广泛性相结合，扩大培训对象范围，注重人才培养的计划性、连续性与全面性。坚持业务能力与政治素养相结合，把提升参政议政能力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坚持理论培训和实践锻炼相结合，在提升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理论政策水平同时，通过部门交流、挂职锻炼、考察调研等方式，引导他们把学到的政治理论知识转变为实际参政议政的能力。

三是加强管理，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对他们的评价，要综合考虑政治能力、社会声望、责任担当、个人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不能仅关注他们的办事能力、个人财富等。对代表人士的评价不能简单“见一见、谈一谈”，而要广泛听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等意见，并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代表人士数据库，全面掌握其现实表现，预判其成长趋势，从而确保代表人士评得准、选得对。

四是选拔任用，适度加大政治安排。本着坚持党内党外标准一致、体制内体制外标准一致的原则，将新的社会阶层中党外代表人士的选拔任用标准具体化、明细化，实现提名、举荐、安排等程序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运作。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优先选拔安排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对他们的政治安排应建立“权、责、利”对等机制，给予德才兼备、能力突出的优秀人才更多的发挥作用的平台或机会。

（四）健全有序政治参与机制，提升政治引领的效能

一是加大政治吸纳，确保政治参与的有序性。按照“用好现有组织、创建工作载体”的要求，着力打造广覆盖、多层次、立体化的组织平台体系，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吸纳、整合到各类组织之中，确保其政治参与过程有序、可控。按照《党章》要求，可以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优秀人员吸收到党内。稳步推荐层次较高、界别对应的

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加入各民主党派或成为无党派代表人士。推荐更多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进入群团组织，担任兼职领导，或进入各级行业协会、商会的领导班子。

二是加强民主协商，提高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按照“行业+专业”思路，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参与协商，“着力构建由点到面，从经济、生态协商到政治、文化、社会协商，从公共项目立项到实施等协商格局”^[17]。坚持线下协商与线上协商相统一。既要坚持和完善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既有协商形式，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所在基层党组织、界别议政建言；又要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善于利用网络平台打造云协商、微协商等线上方式，畅通收集和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协调、纵横联动衔接、多元多层全覆盖的协商民主体系”^[18]。

三是参与社会治理，扩大政治参与的公共性。根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同群体特长和优势，组建智库、服务团或“专业委员会”等，有针对性地组织他们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进行深入调研，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通过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引导他们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发挥他们在志愿服务、慈善救助、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巨大力量。发挥网络作家、非遗传承人、自由演艺人员等自由职业人员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使他们创作更多优秀文化作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发挥网络人士、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群体在重大舆情引导、正面舆论宣传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五）建立方式方法创新机制，优化政治引领的方式

一是坚持精准化，分众分类施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四类群体既具有共性特征，又各有不同，即使同一群体内部也存在明显差异。必须着眼各群体特点进行分众、分类研究，针对不同群体、

不同对象采取精准统战方式，抓住重点人群，突破一点、带动一片。

二是坚持社会化，激发社会活力。改变统战部门大包大揽的做法，突破传统政治引领工作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的限制，由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延伸。按照社会化工作思路，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优势，通过对话协商、项目共建、委托授权等方式将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整合起来，推动政社互动、社社联动，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由统战工作对象转变为统战工作力量，实现政治引领工作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

三是坚持网络化，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把“面对面”与“键对键”结合起来，通过线上线下紧密互动，实现线上发起、线下落地，线下活动、线上传播的良性循环。用好官方网站、客户端、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在政策宣传、信息交流、议政建言、服务帮助等方面加强线上互动。善于通过网络建立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经常性联系渠道，把握他们的思想动向和利益诉求，为他们提供全方位、宽领域、零距离的一站式网络综合服务。

四是坚持柔性化，增进情感认同。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以博大的胸怀和容人的雅量，通过倾听、对话和耐心沟通，消除认识上的差异，在交往交流交心之中，引导他们把对中国梦的认知由“激动一时”升华为“追求一生”。

参考文献：

- [1] 刘树燕. 政治社会学视域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3): 110.
- [2] 朱凯玲. 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23.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35.
- [4] 杨光斌. 政治学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6.
- [5] 欧彦伶. 党对青年政治引领的逻辑链条 [J]. 晋中学院学报, 2024(6): 21.
- [6] 陈伟东, 舒晓虎. 社区空间再造: 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推力 [J]. 江汉论坛, 2010(10): 133.
- [7] 谢小芹. “脱域性治理”: 迈向经验解释的乡村治理新范式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3): 64.
- [8] 张海东. 对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重要作用的几点思考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5): 89.
- [9] 王建平. 中产阶级: 社会和谐积极力量 [J]. 天津社会科学, 2008(4): 65.
- [10] 蒋俊明. 我国中间阶层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与政治应对 [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3): 53.
- [11] 李春玲. 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4(6): 109.
- [12] 秦广强.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异质性与动态变迁分析 [J]. 青年研究, 2018(1): 4.
- [13] 袁博, 何勇平. 地位不一致性与相对剥夺感——对西部某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研究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6): 49.
- [14] 秦广强.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功能及社会整合研究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5): 97.
- [15] 顾辉. 社会阶层变迁视域下新社会阶层的结构性特征及发展路径——以江苏省综合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J]. 社会科学辑刊, 2024(5): 148.
- [16] 侯东德, 薄萍萍.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吸纳研究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4): 88.
- [17] 刘振强.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J]. 黑河学院学报, 2020(2): 11.
- [18] 王乃波. 商以求同协以成事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J]. 大连干部学刊, 2016(7): 20.

责任编辑: 吉强

讲好中国故事视域下数字创意群体建设力研究： 内涵、实践与统战工作路径

张伟伟 吉 强

摘要:数字创意群体,是在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深度融合中形成的新兴职业群体。他们是从事数字文化产品供给的技术研发者、内容生产者、产业服务者,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繁荣中能够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以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为观察视角,其建设力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文化内容生产的创新力、文化资源整合的凝聚力、文化内外传播的影响力;其建设力的实践,先后经历了“自在”“自为”“自觉”三个递进阶段。可从认同自觉、实践自觉、责任自觉三个维度,加强对该群体的统战工作,从而在数字化发展大潮中,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一支有认同、有创意、有担当的生力军。

关键词:数字创意群体;建设力;讲好中国故事;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近年来,《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影视作品及中国网络文学广受国际关注;《黑神话:悟空》等游戏更以东方美学与精良制作成为文化传播新载体。这些数字创意产品不断拓展了文化传播形式,有效提升了中国故事的覆盖面与感染力,在此过程中,

数字创意群体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既是内容创作者,也是技术融合与叙事创新的践行者,通过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产品。数字创意群体凭借富有创意的表达形式与开阔的国际视野,依托互联网平台搭建起中外受众沟通的桥梁,推动中华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效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内外影响力。深入分析数字创意群体

收稿日期:2026-02-24

作者简介:张伟伟,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网络人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网络新媒体、网络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吉强,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网络统战、统战宣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高端智库课题“激发数字创意群体创新创造活力实践研究”(ZK0120250148)、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素养向产业链贡献度转化路径研究——以南京为例”(25ZY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及其建设力的理论内涵、实践经验与统战工作路径,是回答在“十五五”时期“如何全面发挥新的社会阶层建设者作用、系统汇聚‘新阶层建设力’”的现实需要。已有涉及数字创意群体及其建设力的学术探讨,多侧重于理论思辨与案例阐释。本研究注重实证考察,立足数字创意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选择我国数字创意群体集聚程度高的长三角地区作为调查区域,采用立意抽样方法,面向该区域数字创意群体开展网络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30份。同时,辅以深度访谈与座谈共计31人次,并对该群体的典型工作与生活场景开展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该群体及其建设力作进一步探讨,并提出统战工作的实践路径。

一、数字创意群体的概念与特征

(一) 数字创意群体的概念

数字创意群体的概念源于文化创意产业,并随着文化创意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而不断演化。早期研究侧重其“创意”属性,将其界定为文化艺术、设计等领域的内容生产职业群体^[2]。伴随产业迭代,其内涵逐步拓展,涵盖影视、游戏、短视频等多领域从业者^[3]。依循功能分化视角,数字创意群体可以归纳为三种职业类型。一是数字创意技术人员,他们构成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力量,专注于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4],通过技术创新为内容生产提供工具平台与底层架构,驱动数字创意产业的技术跃迁^[5]。二是数字创意内容生产人员,他们是内容创作的核心行动者,涵盖网络文学写手、游戏原画师、短视频创作者等群体^[6],他们依托数字平台开展创意生产,其劳动形态呈现出“数字灵工”的后福特主义特质^[7]。三是数字创意服务人员,他们是产业生态中的联结性力量,涵盖数字营销人员、用户体验设计师等职业角色^[8],在技术、内容与市场之间发挥中介与整合功能,推动创意设计赋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9]。上述三类群体协同共生,构建了数字创意产业的人才生态体系,并以分工协作与跨界创新驱动产业系统的持续演化。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数字创意群体已在客观上成长为一个新的职业群体,他们普遍不占有传统生产资料,而是以数字技术、创意能力和知识产权为核心资本,通过平台和数字工具进行创作协作,与资本形成既依存又博弈的复杂关系。在利益层面,数字创意群体关注数字版权、数据隐私、算法公平性、税收优惠与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等议题^[10]。这些共同经济地位、职业特征与集体诉求,叠加数字经济持续扩张的时代背景,使该群体被视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11]。

简言之,数字创意群体是在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深度融合中形成的一个新兴职业群体,他们是依托数字技术及载体,以创意为内核,从事数字文化产品供给的技术研发者、内容生产者、产业服务者。对于统战领域而言,该群体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数字创意群体的时代特征

本研究从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政治面貌与职业发展五个维度,系统考察数字创意群体的时代特征,旨在勾勒其在讲好中国故事实践中的主体面相。研究发现,数字创意群体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异质与动态的新兴职业群体,其多代共存的年龄构成、知识密集的文化资本、相对优渥的经济基础,以及灵活流动的职业形态等,共同构成了他们的独特画像。

1. 年龄结构上,多代共存特征明显

调研发现,在受访者中,“31—40岁”与“41—50岁”的中青年居多(分别占29.1%与37.0%),“21—30岁”的年轻一代(占12.2%)、“51岁及以上”的年长一代(占21.3%)亦占据相当比例,另有极少数20岁及以下者(占0.4%)。年长一代多为传统文化创意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者,其中不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为数字创意生态注入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技艺传承。中青年群体作为行业的中坚力量,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与专业技术能力,善于推动计算要素与美学要素的系统性融合,是产业创新的核心行动者。年

轻一代则多依托平台经济与零工模式崛起，其职业路径常始于业余内容生产，在积累网络影响力等社会资本、获得传统机构专业认可后，逐步进行职业化转型或自主创业，展现出强大的自适应能力与非制度化成长特征。多代共生、代际协同的年龄结构，有利于多元化、多路径讲好中国故事。

2. 文化程度上，普遍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

调研发现，在受访者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个体占 55.2%，大专学历者占 24.3%，研究生学历者（包括硕士层次和博士层次）占 10.9%，大专以下学历者仅占 9.6%。这一分布表明，数字创意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人才，知识密集型特征显著。这为将中华文化转化为具有全球传播力的叙事产品提供了认知基础。值得关注的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高学历者已占据一定比例，反映出部分领域对深层次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的需求正在不断提升。

3. 经济状况上，具有物质中产特征

从收入水平来看，该群体具有显著的高收入倾向。调研发现，超过九成（90.5%）的受访者年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5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65 万元）。其中，年收入“6—10 万元”的比例最高，为 30.4%，“11—20 万元”的占 27.0%，“21—30 万元”的占 14.8%，“30 万元以上”的达 18.3%。这显示出该群体较高的薪酬竞争力。在资产持有方面，93.5% 的受访者拥有自有房产（见表 1），这反映出他们具有稳定的资产积累能力。从消费水平来看，84.9% 的受访者拥有私家车，体现了其生活方式的“中产化”特征。综上所述，数字创意群体在收入水平、资产配置与消费能力三个维度均展现出良好的经济状况，他们是一个

表 1 数字创意群体拥有自有房产情况

是否拥有房产	百分比
是（1 套）	51.3%
是（2 套）	33.1%
是（3 套及以上）	9.1%
否（租房）	6.5%

具有鲜明“物质中产特质”的新兴职业群体。良好的经济状况可为其高质量创作提供物质保障。

4. 政治面貌上，群众居多

在受访者中，中共党员占 29.6%，共青团员占 6.5%，民主党派成员占 12.6%，无党派人士占 11.3%，群众则占 40%。这一政治面貌分布表明，数字创意群体在组织联系、思想引领与政治参与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空白地带，亟待通过精准有效的统战工作加以关注、团结与吸纳。

5. 职业发展上，呈现出高流动性特征

调研发现，该群体的职业稳定性较低。在受访者中，仅有 21.3% 的从业者从未更换过工作，更换工作 1—2 次者占 51.7%、3—4 次者占 23.1%、5 次及以上者占 3.9%。这一非连续、多向转换的职业轨迹，可从个体和行业层面加以分析。个体层面，反映出从业者对自主性、多元体验与技能增值的积极追求，专业资本赋予其较强的跨域就业能力；行业层面，反映出数字创意产业的项目制模式、平台化用工及高度竞争的生态。

二、数字创意群体建设力的内涵与实证考察

（一）数字创意群体建设力的内涵

在数字技术革新与政策引导下，数字创意群体在国际格局与传媒生态双重变革中的建设性作用，已成为学界研究重点。作为中国故事海内外传播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的建设力存在于叙事方式的革新、生产组织的协同与文化产品的呈现之中，主要体现为文化内容生产的创新力、文化资源整合的凝聚力、文化内外传播的影响力。

在叙事层面，数字创意群体的建设力体现为文化内容生产的创新力，其核心在于通过媒介形态创新与传播技术赋能，重构中国故事的表达体系^[12]。不同于传统传播模式的单向输出，该群体依托视觉化、互动化、游戏化等多元媒介形态，打破了中国故事传统表达的话语局限，将抽象的文化内涵与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叙事内容；同时，通过挖掘真实可感的生活细节、打造高质量的视觉呈现，搭建起海内外受众与中华文化之间的情

感联结，有效激发跨文化情感共鸣^[13]。

在生产层面，数字创意群体的建设力体现为文化资源整合的凝聚力，其核心在于通过异质性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协同创新，构建可持续的中国故事生产生态^[14]。数字创意实践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其需要设计、技术、叙事、运营等多领域资源的协同支撑，而数字创意群体基于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打破了不同领域的资源壁垒，实现了各类创意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深度融合。这种以凝聚力为支撑的协作模式，不仅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创意生产生态，更通过协同创新加速了中国故事相关内容的迭代升级，提升了作品的质量与竞争力，进而有效吸引海内外受众关注，深化其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兴趣与价值认同^[15]。

在文化产品层面，数字创意群体的建设力体现为文化国内、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字平台赋能与个性化创作实践，推动中国故事实现从“出圈”到“出海”的传播跃迁^[16]。依托各类数字传播平台的便捷性与传播力，数字创意群体以个性化、年轻化的表达视角，自发生产富含中华文化元素的优质内容，打破了传统主流传播的话语定式，让中国故事以更具亲和力的方式触达海内外受众^[17]。这种自发式、多元化的创作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国故事的传播内容与表达形式，更推动中华文化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深度渗透，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二）数字创意群体建设力的表现

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围绕创新力、

凝聚力、影响力，对该群体的建设力展开实证考察。在创新力方面，聚焦该群体对自身创新能力的认知与评价，揭示其在叙事内容与形式上的创造性实践；在凝聚力方面，定位于政治认同维度，考察数字创意群体如何在文化资源整合中形成价值共识，进而驱动生产实践与国家发展进程实现“同频共振”；在影响力方面，从政治参与、社会参与两个维度切入，分别观察其在制度性场域与公共性空间中的行动实践。调查显示，数字创意群体普遍对自身创新能力持肯定态度，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认同感，在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同时，亦频繁进行各种形式的网络参政。这些表明，该群体作为中国故事的重要建构者与传播者，其建设力正通过创新、认同与参与三条路径，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得以具象化呈现。

1. 在创新力方面，数字创意群体表现出较高的自我认同

创新力不仅是技术迭代的结果，更是主体价值的自我确证。考察数字创意群体的创新力，就是考察其是否以积极的自我效能感为内驱力，重塑产业形态、拓展价值链条。具体而言，聚焦该群体对自身创新能力的认知与评价，以揭示其在叙事内容与形式上的创造性实践。在涉及自我评价的相关测量指标中，各项均值接近或超过4分（满分为5分）。具体而言，受访者高度认同自己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造者”“集群化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数字化升级的积极推动者”，以及“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的重要力量”（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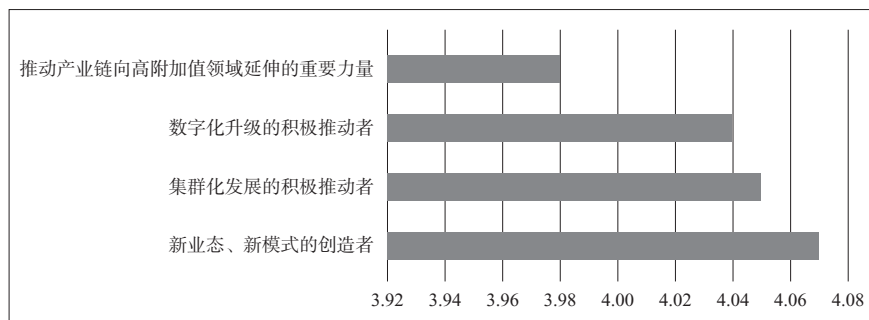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创意群体创新力自我评价

上述结果说明，数字创意群体对自身创新能力具有高度自信，这一认知不仅源于其在新业态创造、集群化推动、数字化升级及产业链提升等方面的实践贡献，也折射出他们在技术迭代与市场竞争中持续构建的积极自我价值认同。

2. 在凝聚力方面，数字创意群体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认同

凝聚力不仅体现在人员聚合方面，也体现生产目标聚合方面。当数字创意群体的创作活动“聚”向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主流价值观时，这种生产层面的凝聚力正是政治认同在实践层面的投射。考察数字创意群体在文化资源整合中的凝聚力，就是考察其是否以国家发展需求为公约数，整合不同资源、引领生产方向。在涉及对政府及其行为的态度的四项测量指标中，各项均值均超过 4 分（满分为 5 分）。具体而言，受访者普遍认同“政府公共服务值得肯定”“政府提供的信息值得信任”“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程度值得肯定”“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反应积极有效”（见图 2）。

调查表明，数字创意群体在政治态度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认同倾向，他们对政府公共服务、信息透明度及舆情回应能力的认可，反映出其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形成了深层次的思想共识与价值共鸣。

3. 在影响力方面，数字创意群体展现出积极的社会、政治参与性

影响力不仅是文化传播效能的外显，更是社会责任的深度践行。考察数字创意群体在制度性场域与公共性空间的影响力，就是考察其是否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参与国家治理、投身社会服务。在社会参与的测量中，两项均值均超过 4 分（满分为 5 分）。受访者普遍表示，自己“积极参与社会服务”（4.31 分）、“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4.19 分）。这表明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与行动意愿。在政治参与方面，呈现出“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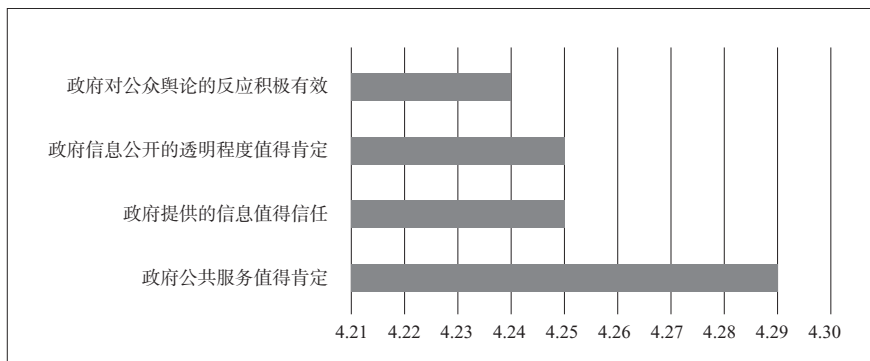


图 2 数字创意群体的政治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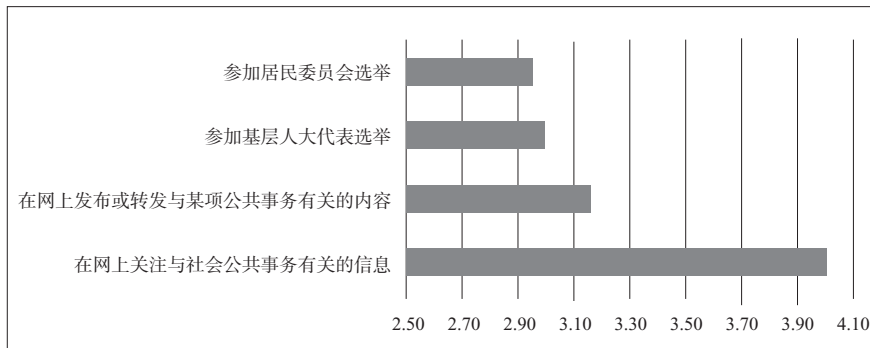


图 3 数字创意群体的政治参与

活跃、线下有限”的特征（见图3）：他们频繁“在网上关注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关的信息”，较多“在网上发布或转发与某项公共事务有关的内容”；但较少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与居民委员会选举。调查数据表明，数字创意群体虽在网络公共事务中表现活跃，体现出较强的舆论影响力，但在制度化政治参与层面仍显不足。

（三）数字创意群体建设力的形成轨迹

以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为观察视角，可以发现，数字创意群体建设力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在探索中积累、在反思中完善、在时代中演进的动态过程，始终贯穿于个体成长、技术进步与国家发展的交汇脉络之中。“自在”与“自为”原为黑格尔用以描述绝对精神发展阶段的哲学范畴。其中，“自在”指未被意识所觉知的存在状态，“自为”则指已被意识所觉知并把握的存在状态^[18]。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觉”是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世界时所特有的主体能动性，它表现为通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以主体的姿态能动地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发展^[19]。借鉴上述理论视角，结合访谈资料分析，可将数字创意群体建设力的形成轨迹概括为“自在”“自为”“自觉”三个递进的实践阶段。

1. “自在”实践阶段

在“自在”实践阶段，数字创意群体尚未形成对“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宏大目标的清晰认知与主动认同。彼时，他们的实践主要源于职业本能和个体职业发展的驱动，技术精进、项目完成与市场认可构成了其价值坐标的核心维度。他们并未清晰意识到自身创作已嵌入国家文化传播的宏大叙事之中，更未能将个人职业行为与创新力、凝聚力、影响力关联起来。正如一位受访者D所言：“做我们这一行的大多是小而美的公司，我们需要专业能力、抗压能力、职业沟通技巧来做好甲方需要的产品，在市场上活下去。”这段陈述典型地反映了“自在”阶段的实践特征：群体成员以技术能力与职业素养进行自我定位，其关注点

集中于生存适应、项目执行与行业认可，尚未将个体实践置于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加以审视。当作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甚至客观上产生了跨文化传播效应时，他们往往关注成功背后的市场机遇或技术优势等因素，较少主动思考自身在讲好中国故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建设性作用。

2. “自为”实践阶段

在“自在”实践阶段，数字创意群体尚未意识到自身职业实践已悄然嵌入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叙事之中，其建设力处于“在场”而未被觉知的潜在状态。转变契机往往源于“意外”的制度反馈与社会认同。当群体成员凭借实践成果获得来自党政部门或社会层面的表彰嘉许时，一种认知张力被激活：为何“本职工作”竟能收获超出预期的社会认可？这一追问驱动着数字创意群体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反思”，开始审视自身实践的意义。正是在反思过程中，数字创意群体逐步实现了个体职业逻辑与国家战略逻辑的对接，完成了从“自在”向“自为”的认知跃迁。受访者L的论述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转变：“数字创意已不仅是文化消费的新热点，更是撬动经济、催化产业融合升级的杠杆。短剧的风口便是明证，‘黑悟空’这样的原创IP已经验证了本土故事借助数字技术走向全球的可能性。”

3. “自觉”实践阶段

在“自觉”实践阶段，数字创意群体完成了从“有意识融入”到“能动性建构”的质变跃迁。随着对讲好中国故事战略意涵的理解持续深化，以及对自身创新力、凝聚力与影响力提升的系统性追求，该群体开始立足本土文化根脉与个体实践经验，主动自觉地建构、阐述并传播中国故事。这一阶段的核心标志，是数字创意群体实现了从“执行者”到“建构者”的角色转换——他们能够以创造性思维重新诠释传统、以当代话语重新编码文化。正如受访者G所言：“作为文化从业者，我们面临的真正命题是如何用当代话语体系传承5000年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既要保持高投入、长

周期的精品制作，也要善用微短剧这类新载体，以低门槛、高触达的方式把历史故事讲给下一代听、讲给国外受众听，让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持续焕发生命力。”至此，数字创意群体的建设力完成了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觉”的三级跃迁——从“无意识在场”到“有意识融入”，最终抵达“能动性建构”的理想状态。在这一阶段，讲好中国故事已内化为群体的价值信仰与行动自觉，其创新力、凝聚力与影响力不再仅仅是外部评价的标尺，而是自我驱动、自我迭代的内在能力。

三、数字创意群体的统战工作路径

“十五五”时期，数字创意产业将迅猛发展，数字创意群体规模将呈指数级增长。如何有效团结和引导该群体自觉发挥建设力，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理应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基于其建设力“自在—自为—自觉”的形成轨迹，可从认同自觉、实践自觉、责任自觉三个维度，加强对该群体的统战工作。

（一）强化价值内化与身份认同，培育认同自觉

一是构建价值融入与思想协同机制。一方面，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数字资源，开展沉浸式党史、国史与统战史教育，增强数字创意群体的家国认同和行业归属感。另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全流程实践——引导内容生产人员聚焦时代主题与民族自信，以正向叙事弘扬主流价值；推动技术人员将公正、向善等理念作为技术研发的伦理基石，坚持科技向善的价值取向；强化服务人员的大局意识，促进专业服务与国家发展、社会需求深度融合。二是建立身份激励与舆论褒扬机制。可定期评选“数字创意先锋”，通过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其贡献，强化他们的群体荣誉感，提升社会对他们的认同感，激发他们的内在动机和身份自觉。三是建立系统化人才库与动态追踪机制。构建数字创意重点人才数据库，持续追踪其职业发展、成果贡献与思想动态，及时把握群体变化趋势和个体成长路径。结合数据分析，定制化提供政策引

导、资源支持与思想关怀，增强人才的组织归属感和政治向心力，实现从发展、跟踪到价值凝聚的深度认同培育。

（二）提供赋能平台与容错环境，激发实践自觉

一是搭建数字创意协同实践平台。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应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数字创意协同平台体系。由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推动形成国家级引领、省级支撑、市级落地的三级平台架构，并积极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共同参与。通过整合各级资源，建设开放共享的技术工具库、创意素材库和协同创作社区，有效降低创新门槛。同时，为数字创意群体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和多元化的实践场景，推动其在真实项目中实现能力提升与协作共创，形成多方协同、立体赋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二是构建数据驱动的政策与服务推送机制。利用 AI 和大数据分析群体行为特征与创新需求，实现政策、资源、培训的智能匹配，加强主动服务，支持其自觉将相关政策转化为具体实践。三是建立创新友好型治理与容错保障机制。推行负面清单与创新观察期制度，对在技术探索、业态融合、内容实验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在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 3 年至 5 年的包容期；配套设立跨域补偿基金、建立快速版权确权机制，减轻试错成本，激励其自觉实践与持续探索。

（三）强化社会责任与行业生态赋能，塑造责任自觉

一是构建“产业—人才—资本”责任共同体。推动数字创意群体更好地融入现代产业链，通过“数实融合”重点项目引导其自觉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同时，在相关母基金与专项基金投资决策中纳入社会责任评价指标，塑造“资本守候创新、创新反哺社会”的行业生态。二是建立人才流动与安全责任预警机制。整合多部门数据，构建动态人才数据库，实行三级风险预警，强化群体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和数据跨境安全中的主体责任

意识。三是实施技术自强与伦理自律行动。可设立“数字创意国产化替代”专项，鼓励群体自主研发核心工具与底层技术；建立行业伦理公约和内容自查机制，增强其导向自觉和责任担当。

四、结语

在“十五五”时期，加强数字创意群体的统战工作，不仅是凝聚人心的政治需要，也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重要途径。通过精准有效的统战工作，将分散在虚拟空间、活跃于全球平台的国内数字创意人才有效组织起来，引导他们的职业实践从自在自为走向文化自觉，让他们在数字叙事中自觉嵌入传统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中国价值，从而在数字化浪潮中，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数字化转型构建一支有认同、有创意、有担当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8.
- [2] 金元浦.文化创意产业四题——关于加快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几点思考[J].求是，2012(8)：55.
- [3] 陈刚，宋玉玉.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9(2)：84.
- [4] 陈能军，史占中.5G时代的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中国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44.
- [5] 王熠.人工智能与数字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与创新[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102.
- [6] 何威，陈菲尔.迷思与内卷：以游戏原画师为例的数字艺术劳动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3(1)：15.
- [7] 刘金波，丁树佳.数字灵工：平台创意劳动者“剪刀手”群体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9)：122.
- [8] 赵立博，王春辉.数字时代的语言零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2.
- [9] 周珂，胡琳，王睿志.数字创意设计赋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策略[J].社会科学家，2023(11)：66.
- [10] 向勇.“创意者经济”引领数字文化产业新时代[J].人民论坛，2020(19)：132.
- [11] 黄斌，向勇.创意者网络：互联网语境下创意阶层的演化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2)：50.
- [12] 林玉佳.《王者荣耀》是怎样被海外玩家接纳的？——一项基于国产游戏出海的扎根研究[J].当代传播，2024(1)：101.
- [13] 刘一瑾.讲好中国故事：元宇宙视阈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新思考——评《元宇宙与未来媒介》[J].当代电影，2023(11)：1.
- [14] 洪宇，刘福利，颜昊.中国数字文化出海与软实力构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53.
- [15] 郭瑾.发展数字文化产业与我国软实力提升研究——以tiktok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2021(5)：116.
- [16] 段鹏，彭晨.数智时代短视频助力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创新路径[J].中国编辑，2024(3)：5.
- [17] 王婉波.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出海及海外传播实践[J].文学评论，2025(4)：166.
- [18] 徐广垠.“自在”与“自为”维度下的“意识”概念[J].广东社会科学，2022(4)：281.
- [19] 孙正聿.辩证法的批判本质[J].中国社会科学，1992(4)：66.

责任编辑：徐晓婷

人工智能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作用机制、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

方锦波 王 智

摘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为这一群体建设力的发挥开辟新的空间。在作用机制上,人工智能正多维度赋能这一群体:智能化信息推送可强化其政治认同,数据分析与人机协同可提升其专业创新能力,产业数字化转型可拓宽其参与经济发展的空间,智能工具可拓展其社会治理参与渠道,内容生成与传播可提升其文化传播效能。然而,这一进程也面临多重现实挑战,突出表现为技术应用不均易形成新的数字鸿沟、信息生态失衡阻碍价值整合、人机协同中主体定位弱化创新价值、治理责任体系滞后影响赋能稳定性。需协同构建赋能框架以夯实发展基础、强化价值引领以规范实践导向、深化人机协同以激活创新动能、构建多元治理体系以筑牢安全屏障,从而系统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持续释放。

关键词:人工智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

“建设力”概念的提出,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发挥的理论凝练,它高度概括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建设者的能动性、创造性与贡献性^[1]。具体而言,建设力集中体现为五大维度。一是政治向心力^[2],即在自觉拥护党的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主动参与政治协商、建言献策,凝聚

政治共识、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二是专业创新能力,即立足自身行业领域开展技术、模式、内容创新的能力。三是经济发展推动力,即通过创业就业、产业升级、资源整合等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四是社会治理参与力,即主动参与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完善治理体系的能力。五是文化传播引领力,即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流

收稿日期:2026-03-15

作者简介:方锦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统一战线。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与逻辑研究”(21ADJ00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暨省统一战线工作研究专项课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体系构建研究”(25TJZB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价值、促进文化交流的能力。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日益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进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3]由此,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团结、引导和服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汇聚其建设力,是顺应数字智能发展趋势、加强统战工作实效的必然要求。

一、人工智能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作用机制

立足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群体特征,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在凝聚他们政治向心力、赋能其创新能力、驱动其事业发展、拓展其社会参与、汇聚其价值共识等方面的作用机制,既能丰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理论体系,也能为实践中更好发挥该群体建设力,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 凝聚政治向心力,锚定建设力发挥的坐标

人工智能通过精准化引导、便捷化联通、常态化教育,能够不断强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其建设力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挥效能。一是精准推送政治引领内容,强化思想共识凝聚。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可精准捕捉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关注热点与认知需求,实现政治引领内容的分众化推送。同时,通过人工智能多模态生成技术,将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以短视频、图文解读、互动问答等形式进行传播,可增强内容的吸引力与接受度^[4]。二是搭建智能沟通平台,畅通政治参与渠道。人工智能及数字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为广泛联系、有效覆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了新的组织载体。通过数智统战平台可将分散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效链接起来,做好思想

引领、建言献策等工作,形成虚实结合的同心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通过平台提交意见建议、了解统战工作动态、参与各类政治学习活动,更精准地参与国家治理、政策制定,从而增强自身政治归属感与责任感。三是强化政治素养培育,筑牢思想根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素养直接决定其建设力的发挥方向。通过人工智能舆情分析技术,实时捕捉社会热点、舆情动态,及时推送权威解读与引导内容,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明辨是非、坚定立场,自觉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蚀。借助虚拟仿真、情景模拟等人工智能技术,还原政治参与场景、政策执行过程,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直观地理解党的政策、感受国家发展成就,从而进一步增强其对国家发展大局的认同感,推动其建设力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

(二) 提升创新能力,筑牢建设力发挥的主体根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知识型、专业型与创新型人群构成,人工智能通过赋能其专业能力与创新能力,夯实其建设力发挥的主体根基。一是人工智能通过“认知增强”提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认知层次。在认知方式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往往依靠线性思维与自身经验。人工智能基于多源异构数据,能够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群体特征、专业领域、能力特长、兴趣偏好,以及社会关系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挖掘与多维度建模,提供系统、显性的结构化信息,以此帮助他们拓展认知的时空边界与视野。二是人工智能通过“能力延展”增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分析能力。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模拟推演和预测分析能力,可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突破自身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获取、处理与整合信息的能力。例如,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可利用人工智能快速完成市场数据分析、商业方案撰写等。又如,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可通过人工智能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高效生成法律服务文书和财务报表等。三是人工智能通

过“人机协同”释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造力。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迭代升级，社会正步入一个以人机协同为特征的文明阶段^[5]，深刻改变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造力的生成与作用范式。人工智能中的多智能体协同算法与分布式协作模型等技术，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跨时空、跨领域群体协作提供了底层架构支持，使其能够更专注于创意构思、核心技术攻关、个性化服务等更能体现自身独特价值的领域，从而最大程度激发个体创造潜力。

（三）驱动产业创新发展，激活建设力发挥的经济动能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活跃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和各类社会领域，人工智能为其建设力在经济领域深度延伸、充分释放提供了多元化路径，有效激活了建设力发挥的经济动能。一是助力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夯实建设力发挥的产业基础。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与企业生产、管理、营销等全链条的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运营体系，推动民营经济摆脱传统规模扩张式发展路径，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型，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管理与技术优势提供了技术支撑^[6]。二是赋能新业态培育壮大，拓宽建设力发挥的空间。相当数量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来源于中国经济社会中的新业态和新产业^[7]，他们主要聚集于新媒体、直播电商、数字文创、在线咨询等新兴经济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与新业态的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产业的发展边界与模式局限，催生了一系列全新的产业模式与服务形态，推动新兴经济领域的内涵不断丰富、业态不断升级，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的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引领地位。三是推动现代服务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提升建设力的质量水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广泛分布在咨询、设计、营销、法律服务、教育培训等现代服务业领域。人工智能以强大的知识处理、数据分析与内容生成能力，为这些领域的专业服务赋能。同时，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优化服务流程、简化服务环节，推动现代服务业实现精细化运营，进一步拓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的发挥场景，提升其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贡献度与影响力。

（四）拓展社会治理参与范围，彰显建设力发挥的公共价值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维活跃、观念多元、社会参与意识强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8]。人工智能大幅拓展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公共维度，使其能更高效、更精准地参与社会治理。一是增强建设力发挥的广泛性。人工智能强大的内容生成、模式识别与跨领域关联能力，不仅能够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传统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更助其深入文化创作、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等场景，进而拓展其建设力的发挥维度与社会影响的覆盖范围。同时，通过构建一体化算力调度体系，人工智能实现了算力资源的跨区域、跨领域协同配置，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与市场需求、产业发展、社会需求实现高效对接，破解资源错配难题。二是提升服务供给的精准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专业优势突出，关注社会问题，热心公益事业”^[9]，长期活跃在法律援助、文化传播、社区服务、公益慈善等领域，是社会化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处理技术，能够自动分析海量数据，助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识别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实现服务资源智能匹配与服务内容动态优化。三是提升建言献策的专业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分布广泛、贴近基层、熟悉行业实际等特点，他们提供的信息，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10]。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能够对基层诉求、行业发展问题、社会治理痛点进行大数据分析和智能梳理，从中识别出具有普遍性与针对性的问题，形成有数据支撑且逻辑严谨的政策建议，实现建言献策从经验

型向数据型转变。

(五)凝聚社会共识,强化建设力发挥的传播效能

人工智能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工具,在引导社会舆论、引领文化风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文化传播引领力注入了新动能。一是提升优质内容的生产效能。人工智能的辅助写作、多模态生成、智能编辑等功能,以及精准捕捉受众的兴趣偏好与价值需求优势,可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突破创意表达的技术门槛,高效产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图文、视频、音频等多元化产品,增强主流价值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二是扩大文化传播的辐射场域。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展现出独特且强大的适应性^[11],使信息分发从“人找信息”转向“信息找人”。这一转变,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将专业能力与主流价值传播相结合提供了新的可能。依托人工智能的精准推荐与跨语种转换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创新成果与行业发展故事,实现分众化、精准化、国际化的有效触达。三是涵养向善向上的价值取向。人工智能通过辅助识别信息失真、分析舆情动态与价值偏差,可助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内容生产与传播中坚守人文精神,抵制低俗媚俗,自觉成为清朗网络空间的建设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二、人工智能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现实挑战

人工智能在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技术赋能与应用的非均衡性、信息生态与价值整合的适应性、人机协作中的主体性定位以及治理框架与责任体系的构建滞后等方面。

(一)技术赋能应用不均,易加剧资源和能力的分化

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内容创造、知识获取与解决方案生成能力,为社会各领域带来显著变革。

但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而言,其内部在掌握与运用该技术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可能进一步加剧群体间已有的资源与能力分化,形成新数字鸿沟^[12],削弱建设力得以充分发挥所必需的数据与能力基础。其一,数据获取能力非均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职业覆盖范围广,其内部不同群体的资源获取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优势群体可依托自身行业积累、社会网络,实现精准赋能,而一些群体缺乏数据挖掘、整合能力,难以将自身行为数据、专业经验转化为可利用的赋能资源。二是技术应用能力非均衡。人工智能的有效赋能不仅需要资源支撑,更需要使用者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专业适配能力,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教育背景、职业类型、技术素养差异较大,导致技术应用能力呈现明显分层。三是算法固有的偏见可能造成机会不均。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型建立在既有数据基础之上,可能无意中复现甚至放大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偏见^[13]。

(二)信息生态价值失衡,会对共识凝聚造成干扰

人工智能重构了信息生产的底层逻辑,但这种范式革命也打破了传统信息生产的价值筛选与共识形成机制,使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借助技术发挥建设力的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张力。一是信息生产的泛化与碎片化,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价值甄别出现困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的发挥,关键在于对高质量信息的获取、辨析与运用。然而,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泛滥的生态中,虚假信息、误导性观点乃至蓄意操纵的叙事可能混杂其中,形成所谓“信息迷雾”^[14],这会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现认知偏差,削弱其专业判断的准确性。二是人工智能常以价值中立为技术表象,实质上可能消弭主流价值的引领作用。其算法以数据拟合为核心,倾向于呈现看似客观、去立场化的内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观念本身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多样性,在接触这类内容时易受到其中非主流或隐蔽的价值取向影响,导致

其建设力的发挥偏离正确方向。三是人工智能的个性化生成能力，在推动信息表达多元化同时，也加剧了价值共识形成的难度。不同群体可借助人工智能生成符合自身偏好的内容与表达形式，形成高度定制化的信息环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若过度依赖此类个性化生成，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加剧认知固化，导致其建设力的发挥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特征。例如，部分自媒体博主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符合自身偏好的内容，对不同观点、不同群体的诉求缺乏包容理解，进而会削弱社会整体对话的共识基础。

（三）智能依赖过度，会弱化人的主体创新性

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推动了人机协作模式的全方位重构。在此过程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借助该技术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会因过度依赖技术工具、弱化自身主观能动性，逐步陷入主体性认知模糊与创新力退化的困境中，这会成为制约其建设力发挥的内在障碍。一是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主体性价值的弱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建设力，本质上源于其专业素养、社会洞察、价值判断所形成的主观创造能力。然而，当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内容生产与决策参考的主要依托时，技术所固有的工具理性可能侵蚀人作为建设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例如，部分新媒体创作者、文案策划人员倾向于直接采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框架，这无形中削弱了他们自身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观察和真实情感的表达。二是内容输出的同质化倾向，进一步钝化了创新思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建设力关键在于创新性。然而，当过度依靠人工智能进行创作与思考时，其容易陷入对技术生成路径的深度依赖，丧失面对复杂问题时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突破能力，难以形成推动社会建设的创新性建设力。其三，对算法逻辑的过度依赖，易催生认知惰性。人工智能以高效、便捷的输出模式，将复杂的认知与判断过程简化为技术调用与结果筛选。在这一过

程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能不自觉地形成对算法逻辑的深层依赖，逐渐丧失对输出内容的系统性反思、深度质疑的能力。这种认知上的惰性，可能使他们沉浸于由技术所构筑的“信息茧房”之中^[15]。

（四）治理责任体系滞后，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人工智能在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过程中，因制度规范、监管体系、责任界定的滞后性与模糊性，产生了一系列不确定性风险。一是制度规范建设滞后，模糊技术应用边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涵盖的范围广，群体构成多元，职业类型丰富，而当前人工智能多为通用性框架，缺乏针对不同职业场景的明确规范引导。例如，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商业化应用中的数据合规限度，以及专业服务中辅助决策的适用尺度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制度空白与标准缺失。这使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发挥建设力的过程中，面临合规依据不清、行为边界不明的现实困境。二是跨领域监管体系缺失，难以适应多元应用场景。人工智能在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过程中，通常涉及数据采集、内容生产、平台传播与商业转化等多个环节。然而，当前监管体系仍存在部门分割与职能重叠等问题，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等部门之间尚未形成高效的联动协调机制，导致针对跨领域、跨场景的技术应用行为，缺乏统一、连贯的监管标准与协同治理框架。三是法律责任界定模糊，加剧权责失衡风险。人工智能的人机协作特征，使得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易导致法律风险。例如，当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出现错误、构成侵权甚至造成社会危害时，责任应归属于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还是被视为算法自身的行为？现行法律体系对此缺乏清晰界定。长此以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运用技术时将面临权责不明的现实困境，直接影响其建设力的长效发挥。

三、人工智能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在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过程中面临着多重挑战。为此，应立足该群体的内在特征、现实关切，及其对建设力提升的诉求，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与功能特点，将多元主体协同作为关键路径，整合政府、企业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身的资源与行动，构建系统完备、运行高效、风险可控的整体赋能机制，从而将技术优势切实转化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实际成效。

（一）协同构建赋能框架，夯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基础

人工智能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格局下，构建一个以制度创新为牵引、以技术向善为内核、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系统性框架。一是筑牢制度保障基石，优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治理的制度环境。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设计中，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其参与社会治理、行业建设、公共决策的角色定位与权责边界。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设计与常态化的参与机制，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找到清晰坐标，为其建设力发挥提供稳定的制度基础。二是激活技术赋能引擎，拓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价值创造的实践场域。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连接、分析与智能优势，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赋能平台。注重技术伦理的引导与规范，坚持“技术向善”的价值导向，在算法设计、数据使用、平台规则中嵌入社会责任要求，避免算法结果固化或加剧社会偏见，从而弥合数字鸿沟^[6]。三是厚植人才成长沃土，激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体自觉的内生动力。既注重其政策理论水平的提升，强化其大局意识与家国情怀；也促其关注前沿知识、更新专业技能，保持在数字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更要使其涵养公益精神与公共伦理，引导他们在追

求个人价值的同时自觉服务社会发展，从而实现个人能力与建设力的协同增强。

（二）强化价值引领规范，筑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价值根基

在人工智能赋能新的社会阶层建设力发挥过程中，为规范信息生产传播的全过程，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确保技术应用服务于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一是在信息生产的源头，人工智能平台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17]，将内容安全要求嵌入算法设计、数据训练与传播机制的全过程。应制定高质量训练数据筛选标准，健全完善内容生成前审核机制，从源头抑制违规信息的产生。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亦需加强主体自律，恪守内容生产伦理底线，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主动进行真实性核验、价值判断和伦理审视，以优质信息生产引领正确认知方向。二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加快构建适配人工智能特点的监管体系，厘清合规边界，抑制虚假信息传播。同时，人工智能企业须切实履行技术支撑职责，通过优化模型设计与完善激励机制，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传递务实进取、团结奋进的正能量，确保其建设力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三是在价值共识的落实与实践转化方面，应构建人工智能赋能价值引领的互动平台。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定制化与场景化的价值引领内容载体，紧密结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同职业群体的话语特征与传播习惯，将主流价值理念转化为贴近实际、富有人文关怀且易于接受的内容形态。同时，积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运用人工智能，参与社会公益、政策宣传、行业治理等实践活动，推动其价值认知与实践行动的深度融合。

（三）深化人机协同赋能，激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的创新动能

人机协同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发挥的关键动能，其效能的充分释放，离不开统战部门、企业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协同联动、同向发力。一是统战部门应搭建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创新交流平台,鼓励其利用人工智能开展创新实践,并注重挖掘与推广优秀创新案例。同时,加强人文引导,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确认识人机关系,坚守人文关怀与社会主流价值导向,避免因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而偏离发展方向,确保其建设力始终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二是企业应推动人机协同模式创新。人工智能企业应结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职业特点,优化相关产品设计,构建“人机互补、协同创新”的应用模式。通过技术迭代,增强人工智能在创意激发、数据支持、方案参考等方面的辅助能力,同时为其预留充足的创新空间,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深入参与创作与决策过程,防止因过度依赖技术而导致思维钝化。三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应自觉树立“人机协同、以我为主”的理念,在创新过程中始终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通过建立制度性规范,为人机协同厘清规则、划定边界,防止出现过度依赖技术的情况^[18]。同时,在人际沟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关键领域,应主动弥补人工智能在情感与伦理层面的不足,融入情感共鸣与价值权衡,提升其建设力所带来的社会效益。

(四) 构建多元治理体系,筑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的安全屏障

“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19]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广泛、发展态势复杂,其风险防控需要构建政府、企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协同发力的多元治理体系。一是政府加快法治建设与监管优化。通过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相关法规,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责任归属与应用边界,加强数据隐私、知识产权、算法透明度等关键领域的制度规范,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利用人工智能发挥建设力提供明确的制度框架。二是平台企业应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合规管理。企业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要求,明确人工智能研发、部署与使用的伦理准则。建立覆盖全过程的责任追溯机制,确保技术安全、

可控与可信。同时,通过设置训练算力阈值,把治理的重点放在超大规模神经网络模型的研发和服务上,而对海量中小规模模型的研发活动采取简便的敏捷治理模式,从而实现新技术发展进步和有效治理的平衡。三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需提升合规意识并积极参与治理。要主动学习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提升合规使用意识,自觉防范人工智能滥用、虚假信息生成等违规行为。同时,通过行业组织、议事平台等渠道,反馈实践问题、参与治理讨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专业领域安全、可信、可持续应用。

四、结语

人工智能以数据赋能、算法创新、算力支撑与场景融合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深度参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主流价值传播提供了全新范式。面向未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征程中,随着技术创新的持续深化、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必将以更强劲的建设力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在产业创新、民生服务、价值传播、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 [1] 叶子鹏,杜晓童.建设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识性概念的逻辑生成与框架建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60.
- [2] 林华山.建设力:统战工作一个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样本[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1):8.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26-03-14(7).
- [4] 董伟伟,孟欣.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民主的机制、困境与治理路径[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5):6.
- [5] 王克修,陈琼瑛.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多维挑战与创新路径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25(9):64.
- [6] 权宗田,李明龙.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助力新质生产力

- 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6):47.
- [7] 聂石重,张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代表性评价导向及工作机制创新[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3):55.
- [8] 王智,方锦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与知识生产[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52.
- [9]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125.
- [10] 张海东.新社会阶层的结构化、组织化及发展趋势[J].江海学刊,2019(5):130.
- [11] 高歌.算法推荐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研判及应对策略[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5(5):23.
- [12] 张伟.从数字鸿沟到信息分化:网络社会的圈层化及其阐释[J].理论月刊,2025(12):117.
- [13] 刘保孜,赵云泽.人工智能幻觉现象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研究[J/OL].新媒体与社会.<https://link.cnki.net/urlid/CN.20250806.1102.002>.
- [14] 张梦晗,沈文乾.错位的升级与结构性失序:AI幻觉主导的信息迷雾风险与分类治理可能[J].传媒观察,2025(10):62.
- [15] 黄立赫.人工智能中“信息茧房”的生成与应对[J].图书情报工作,2026(1):99.
- [16] 谢成宇,徐荧松.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现实样态、生成逻辑及治理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5(8):91.
- [17] 蒋博,李明.人工智能发展的文明向度[J].科学社会主义,2025(6):93.
- [18] 孙绍勇,肖健勋.人工智能介入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价值指涉、潜在风险及推进路径[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101.
- [1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8-11-01(1).

责任编辑:吉强

(上接第36页)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5.
- [1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85.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4.
- [13]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98.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95.
-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13.

责任编辑:张丽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出场语境、 范式特征与策略方法

孟 朝 周安忠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作为建构性概念,其出场语境在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叙事需要、弥合发展优势与话语劣势之间存在的落差、解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叙事。在叙事范式上突出文化主体性、历史连续性、空间延展性、情感交互性,更强调叙事中的自主叙事、古今融通、全球对话、共情共振。在行动策略上,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文化引领、党性与人民性、批判性与建设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技术与价值的关系,通过明确叙事主题、确定叙事框架、丰富叙事形式、掌握叙事视角,为中国特色话语叙事提供实践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出场语境;范式特征;叙事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国家综合国力提升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但目前中国受西方话语霸权冲击还存在失语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尚未完全转化为有效的话语叙事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出场语境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出场语境,既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叙事需要的历史语境,又有走出发展优势与话语劣势背反困境的现实语境,还有解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叙事的全球语境。

(一)历史语境: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叙事需要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遭遇空前危机,“古今中西之争”由此展开。在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背景下,“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2]。

“古今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既摆脱传统桎梏又避免文化断裂,既吸收外来文化养分又坚守民族精神根基。在中国近代“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

收稿日期:2025-12-20

作者简介:孟朝,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周安忠,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

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3]。从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器物革新,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西化”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对峙,再到马克思主义传入后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重新探索,这段思想历程,既展现了一代代仁人志士救国道路的艰苦求索,也揭示出仅仅停留于观念争论的历史局限。真正突破这一困局,需要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高度,开创一条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文明发展新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破解长期困扰思想界的“古今中西之争”开辟了历史新境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历史性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这些成就为从根本上回答“古今中西”课题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4]。这一底气的根本来源,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理论上厘清“古今”“中西”之间的关系——西方现代化在时间上的先发,并不等于其道路就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西方现代化的早期启程,也并不代表其逻辑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终极真理性。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5]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根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叙事建构,正是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时代需要的理论回应。其中提出的“第二个结合”重大论断,将人们从要么全盘否定传统、要么全盘照搬西方的思维桎梏中解放出来,把这一历史性争论提升到更高层面的辩证思考,从而在思想根源上超越了“复古”与“西化”的简单对立,为实现文化自觉、坚定道路自信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现实语境:弥合发展优势与话语劣势之间存在的落差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为推动全球经济繁荣与稳定注入强劲动力。我们历史性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要领域,始终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展现担当作为。然而,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中,一些西方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话语优势的需要,频繁利用舆论操纵和传播虚假信息等手段对中国进行不实指责和污名化叙事,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与舆论环境。受西方主导的叙事框架所限,国际社会难以客观、全面认识中国实践所蕴含的发展价值与理念智慧,致使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与发展成就尚未充分转化为相应的话语优势。这一硬实力与话语权之间的不平衡,成为我们在国际传播中需要着力破解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6]这种不相称体现在学术话语的原创性不足,对西方理论框架存在路径依赖,未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因此,解决学术失语要以中国原创理论框架解释本国发展现象,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当务之急。

习近平文化思想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叙事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民族复兴不仅是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崛起,更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7]这说明我们要以精准叙事回应国际社会存在的模糊认识和负面评价,在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和叙事方法上继续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在叙事主体上,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不仅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还需调动专家学者、媒体从业者、民间组织等各方力量,形成叙事合

力。在叙事内容上,深度挖掘中国发展背后的文化内涵与价值理念,以生动具体、真实可感的故事展现中国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刻板印象。在叙事方法上,充分研究受众思维习惯和语言特点,创新传播手段与话语表达,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拓宽传播渠道,采用通俗易懂、贴近国际受众的话语方式,增强叙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三) 全球语境: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叙事

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历史叙事模式,旨在为西方全球扩张服务。它将西方文明置于世界历史的中心,视其为人类理性、繁荣和道德进步的最高阶段,而将其他地区的文明贬低为“野蛮”“原始”“落后”的象征。这一叙事为西方对非西方社会的“统治”“殖民”赋予了道德合法性。西方通过垄断“现代化”定义权,将现代化简化为工业化、城市化等物质层面,掩盖了其依托殖民掠夺的历史本质。任何不符合西方预设模式的国家和文明,都会在道德和话语体系中被污名化或边缘化,这导致后发国家陷入“模仿西方=实现现代化”的认知陷阱。西方中心主义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书写和文化传播中占主导地位,但这一叙事体系目前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它无法解释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实践;另一方面,西方近年来转向单边主义与民粹主义,暴露其叙事无法适应多元主体崛起的全球新格局。

全球现代性危机需要中国文明智慧引领。气候变化、文明冲突、治理失灵等难题凸显了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局限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凝练出了富含时代性的哲学理念,跳出狭隘的民族框架反思时代问题,在世界变局中显示出巨大优越性。面对形势变化,“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

点”^[8]。解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叙事并非简单地反西方,而是反对将西方经验绝对化的霸权逻辑,要指出西方现代化成功是特定历史条件与资本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揭示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历史局限与阶级本质,阐明其意识形态工具属性,从根本上动摇“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理论根基。解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叙事的核心在于重塑文明发展的认知框架,还原多元文明并存共生的历史真相。唯有解构西方话语叙事,坚持以本国实践为根基、以文明平等互鉴为导向,才能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重塑,从而共同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范式特征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是以文化主体性觉醒为内核的系统重构,这一范式在话语叙事上突出文化主体性、历史连续性、空间延展性、情感交互性,强调自主叙事、古今叙事、全球叙事、共情叙事。

(一) 突出文化主体性,关注“自主叙事”

话语叙事的第一要义是确立叙事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核心标识,表现为中国既不盲从教条主义,也不迎合西方中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自我主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9]。这一论断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提供了根本立足点。它强调话语叙事不再是迎合外部标准的“解释”或“辩护”,而是基于坚定自我的自信表达。它要求话语叙事活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的荒谬性,坚持走自己的路,把中国话语叙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以本土性丰富普遍性,关注“自主叙事”。自主叙事绝非走向文化孤立主义,而是以文化主体性为锚点。在“破”的层面上,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叙事垄断,揭露西方将现代化窄化为“西方化”的谬误。例如,西方以技术指标定义“文明等级”,却往往遮蔽其殖民

历史中的暴力逻辑；而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和合共生”的伦理智慧，为超越文明冲突、推动文明互鉴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中国方案。在“立”的层面上，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叙事基石，在内容创新上挖掘“中国之治”的叙事资源，在话语转化上激活传统资源的当代意义，在媒介融合上建构跨媒介叙事体系。这一转向不仅关乎话语权问题，更是对人类文明多元可能性的拯救，最终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愿景。

（二）突出历史连续性，关注“古今融通”

在时间维度上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区分不同话语叙事范式的关键。在近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图谱中，“传统—现代”二元论曾长期占据核心地位，成为解读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主导框架。这种二元对立框架不仅塑造了西方对非西方社会发展路径的想象，更深刻影响了非西方国家对自身文明传统的认知与态度。“传统—现代”二元论源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变革经验，在殖民扩张与全球化初期被赋予普世性意义，成为衡量非西方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尺。这种思维模式在实践中表现为，后发国家若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彻底割裂与自身历史传统的联系，全面移植西方的制度与文化。冷战时期的现代化理论实质上是为美国国际政策辩解的“非共产党宣言”，其核心逻辑在于强调“传统与现代‘水火不容’，传统必被视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时必须抛弃的重负”^[10]。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以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为逻辑根基，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割裂。不仅关注当下，还追溯“我们从哪里来”，将当代中国话语叙事置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宏大脉络之中。这种历史贯通并非简单的历史回溯，而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历史主动性。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关注“古今融通”，本质上是对历史连续性的重新发现。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认识到社会需要

传统，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应该废弃传统的启蒙思想。传统是必需的，而且总是应该坚持，因为它们给生活予连续性并形成生活。”^[11]这种传统的回归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传统要素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文化使“一个社会即便‘藕断’但依然‘丝连’”^[12]，“古今融通”叙事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后发国家探索本土化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克服现代性带来的精神异化，通过回归历史传统寻找身份认同的根基。

（三）突出空间延展性，关注“全球对话”

在空间维度上如何定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决定了话语叙事传播的广度与影响力。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坚持开放包容，使叙事空间从本土语境向全球场域拓展。本土叙事立足特定地域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生活实践，以族群记忆、民俗礼仪、地域符号为核心载体，通过代际传承与日常实践不断强化文化认同，构建具有排他性与稳定性的意义生产机制，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13]，塑造了本土人民的地方归属感与文化自豪感。全球叙事不再局限于讲中国故事给中国人听，而是主动设置议题，将叙事范围覆盖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宏大议题，将中国故事与人类的普遍关切相结合，使中国叙事升华为关乎人类命运的叙事，旨在为解决全人类困境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意味着叙事主体必须具备立足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整体利益进行思考与表达的能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关注全球对话，注重将中国的故事转化为世界的故事，超越本土与全球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关注全球对话的叙事范式并非一个平滑的过渡过程，而是充满了各种内在张力，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认同与全球共同价值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对话要求叙事作品具备一定的价值共通性，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受众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过度追求

共通性又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特色的消解,使叙事陷入文化同质化的困境。在全球对话中,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媒体产业与传播能力,占据了叙事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叙事往往处于边缘位置,这种权力失衡导致全球叙事格局呈现“中心—边缘”的结构。在全球对话的语境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以更开放的视角审视自身的文化传统,通过与其他叙事体系的对话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多元叙事的平等对话中最终实现从本土叙事独白到全球叙事共生的理想状态。

(四) 突出情感交互性,关注“共情共振”

话语叙事的最终效果取决于能否触动人心。话语叙事作为人类沟通与意义建构的核心方式,其形态始终随着社会交往模式的演变而发生深刻变革。在媒介生态深刻变革的当代社会,叙事范式开始从单向叙事转向共情共振。以往单向叙事作为一种传统的叙事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叙事者预设自身的权威性与叙事内容的唯一性,将受众视为被动的信息容器;其运作依赖于信息不对称与权威背书的双重机制,叙事者通过控制信息的生产与发布,确保受众只能接触到经过筛选的内容,这种叙事模式难以弥合传受双方的情感鸿沟。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以情感为纽带,突出情感交互性。情感交互性强调交互中情感的双向流动与动态适配,注重叙事表达的情感传递,通过丰富多样的叙事载体和亲切自然的叙事场景,在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反复触达受众,以具体的人物、生动的细节、起伏的情节来承载情感与价值观,将宏大的政治理念、发展成就转化为可感可知、可触可摸的个体经验与人间烟火,使文化叙事突破时空限制,直击人心最柔软的部分,最终在跨文化传播中使受众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达成理性认同。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关注共情共振,其叙事核心在于构建开放的叙事空间,以情感共鸣为纽带扩大利益汇合点,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意义共享。共情共振叙事模式能够通过整合多元视

角,构建具有包容性的意义体系,其本质是叙事权力关系的重构,其内在逻辑体现为从支配性叙事向协商性叙事的转变。全球性风险的凸显强化了共情共振的现实需求,这种转变需要建立在共通的意义框架之上。从叙事结构看,共情共振叙事打破了单向叙事的线性逻辑,采用多线程、多视角的叙事框架,为受众提供参与叙事建构的机会。从内容表达看,共情共振叙事注重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构建,通过挖掘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与伦理追求,跨越群体差异形成意义联结。从价值取向看,共情共振叙事强调平等与包容,尊重不同群体的叙事权利,避免将单一视角绝对化。这种叙事实践致力于构建多元共生的意义体系,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策略方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方法策略旨在将其理论内容转化为生动具体、贴近生活的语言和故事,确保叙事内容能够真正深入人心,让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原则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原则,体现在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化引领、党性与人民性、批判性与建设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技术与价值的关系方面,为构建中国特色文化叙事体系提供根本遵循。

1. 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化引领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4]经济建设与文化引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是经济建设是文化引领的物质基础。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必须以物质生产所提供的生产资料等为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5],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经济建设对于文化发展的前提性作用。文化虽有自身发展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经济基础而自行发展,相反,文化领

域中任何根本性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变化决定的。如果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文化引领就缺乏现实说服力。二是文化引领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意识形态工作之所以极端重要,是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文化并非经济建设的被动附属品,而是对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能动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集中体现为文化引领的精神赋能与价值规范功能。“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16],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凝聚社会共识、激发主体活力,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2. 正确处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事关文化引领的立场问题,即解决“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党性是一个政党的本质属性,即党的阶级性,不同的政党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因此党性也不同。人民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性总是体现着先进阶级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多数人谋利益,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因此,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本质上是政党与人民关系的集中反映。一是始终坚持党的主张与人民意愿的有机结合。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人民是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的拥护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党的所有工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割裂党性与人民性的错误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只有站在全党、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时刻警惕试图割裂党性和人民性的言论陷阱,才能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3. 正确处理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关系

批判性与建设性贯穿文化引领全过程,体现了“破”与“立”两个向度,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批判性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解构旧世界、建构新世界,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建设性是批判性的落脚点与归宿,是将批判的成果转化为现实变革的具体行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品格。批判性为建设性扫清障碍,建设性为批判性提供方向。“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7]正确处理建设性与批判性的关系,一是坚持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确立过程,就是在批判错误思想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既要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理论建构,还要对错误论调进行批判和矫正。二是要明确建设性与批判性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设。面对西方价值观渗透,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不良论调和错误思潮进行理论性批判和现实性批判。

4. 正确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在价值导向上,民族性要求坚守本民族文化基因与精神标识,世界性则要求突破地域与族群界限,提取各民族文化中普遍认同的价值内核,寻求文化共鸣。一是清醒认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18]这表明,民族性是世界性的根基与前提,世界性是民族性的拓展与升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根脉,而文化的影响力则在于其开放的世界胸怀。要发挥中华文化智慧,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叙事路径,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超越“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实现民族价值与世界价值的共振。二是在话语表达上突出中国特色,并注重国际传播规律。话语表达不仅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还要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时,讲出中国故事背后所传达的世界意义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这

就要求选取贴近国外受众的话语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行阐释。在合理考虑国际社会现实关切的基础上,构建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特色话语体系,逐渐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和误读。

5. 正确处理技术与价值的关系

技术自人类文明肇始便相伴而生,每一次技术跃迁都意味着对人类体能与智能的进一步解放,其本质是以提升效能为导向的理性实践。技术本身具有其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但其社会功能却超越技术范畴,深刻影响着社会价值体系与伦理秩序的形成与演变。今天,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诸如数字监控、认知窄化、人的物化等异化现象,这警示我们必须审慎审视技术与社会价值的互动关系。

一是坚持以人文价值引领技术发展。技术虽能极大满足人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但其自主扩张亦可能脱离应有的人本轨道。哈贝马斯曾指出:“技术与科学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它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已经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19]对此,我们不能认同“技术决定论”的片面逻辑,不能放弃对技术发展方向的必要引导与规范。在实践中,必须始终将以下原则贯穿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安全可控,建立风险预警与治理机制;法治保障,完善技术伦理与法律规制体系;尊严守护,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防止其异化为压迫与支配的工具。二是积极破解算法技术构建的“信息茧房”。个性化推荐算法在精准匹配用户偏好的同时,也易将个体禁锢于固化的信息环境之中,形成认知隔绝。这种无形壁垒不仅窄化视野、强化偏见,还可能助长网络极端情绪与群体对立。因此,必须通过优化算法设计、增强信息多样性供给、提升公众数字素养与批判意识,打破数据过滤泡的束缚,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理性的数字公共空间。

(二)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方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方法在明确叙事主题、确定叙事框架、运用叙事形式和掌握叙事视角等方面展现出系统性、学理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1. 明确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主题

话语叙事的主题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核心与灵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叙事的核心议题、价值立场与思想主张等,揭示其作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纲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一是话语叙事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围绕“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核心议题展开。这一议题并非书斋里的抽象思辨,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旨在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更新而非断裂。其叙事逻辑清晰地表明,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底蕴,而中国式现代化则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二是话语叙事的价值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其话语叙事聚焦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彰显文化的民生属性与育人价值。三是话语叙事的思想主张。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两个结合”思想,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超越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简单并置的思维,它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强调二者的“有机融合”,这一思想主张在实践中呈现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

2. 确定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框架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结晶,需构建一个由本体论、方法论与实践论构成的话语叙事的框架,以系统阐释其内在逻辑与理论体系。一是本体论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体论根基,在于对文化主体性的深刻自觉与时代重构。它确证了文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并非附属要素,而是重要力量。这一本体定位超

越了将文化简单归结为经济反映的机械理解，强调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成为“魂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根脉”，从而生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二是方法论维度。“守正创新”是核心辩证思维，守正聚焦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的文化领导权等核心原则，创新侧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它将文化领导权作为核心方法论，强调通过春风化雨、浸润人心的方式，将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共识，实现了方法论上从“硬性灌输”到“柔性引领”的升华。三是实践论维度。实践论维度聚焦目标导向与行动转化，其核心旨归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使命被具体化为一系列战略部署与实践要求，如“七个着力”“十四个强调”等。

3. 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形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通过历史典故活化、实践案例赋能与故事载体升华三种形式，实现了理论话语的创造性转化，使深刻的思想内涵具象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传播的文化表达。一是以现代科技实现历史典故的活化。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历史典故进行现代阐释，在古今对话中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一话语叙事形式在《平“语”近人》等节目中得到了生动展现，通过“原声短片+经典释义+思想解读+互动访谈+经典诵读”的多元形式，实现了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这种历史典故的话语叙事创新不仅增强了理论传播的亲和力，更在深层意义上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二是以实践案例赋能理论叙事。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通过实践案例展现理论力量，形成“实践—理论—实践”的叙事闭环。实践案例的叙事力量在于其真实性和具体性。通过真实故事，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三是以故事载体进行情感共鸣。习近平强调：“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

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20] 这些故事类型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故事叙事体系，强调讲事实说服人、讲形象打动人、讲情感感染人和讲道理影响人。

4. 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的视角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叙事采用多元视角的交织融合，从全球场域、国家层面、个体实践空间维度层层递进，构建起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叙事分析框架，以深化对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解。一是基于全球场域的宏观视角。宏观叙事视角强调中华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主体性重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置于世界文明对话的前沿，其叙事核心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框架，以“和而不同”的文明观破解文明冲突论的认知误区。宏观叙事通过“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全球文明倡议等实践载体，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文化领域的国际担当。二是基于国家层面的中观视角。中观叙事视角将文化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核心逻辑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话语叙事，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中观叙事视角特别注重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构建，通过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路径，实现文化惠民与文化强国的有机统一。三是基于个人实践的微观视角。微观叙事视角关注文化思想在个体层面的实践转化，强调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创造与享受主体的核心地位。这一视角深入日常生活领域，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如何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引导个体在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行为方式上的积极建构，将宏大理论转化为可知可感的生活话语，激发个体的文化自觉与道德自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 2025: 35.
- [2]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89.
- [3] 冯契.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3.
- [4][5][9]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1、5、9.
- [6][7][16][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81、212、37、212.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111.
- [10] 周晓虹. 理解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五大向度 [N]. 光明日报, 2024-06-07(11).
- [11] 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 [M]. 周红云,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42.
- [12] 韩庆祥, 方兰欣. 文化的力量论纲 [J]. 天津社会科学, 2024(6): 6.
- [13]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M]. 渠敬东,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42.
- [14]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47.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02.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16.
-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40.
- [19]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M]. 李黎, 郭官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4.

责任编辑: 杨玲

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底层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罗 兰

摘 要: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展现出实体支撑的全面革新和认知思维的深刻转变。新质生产力对“怎样生产文化”进行革命性重塑;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实践场域和价值路径。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这一转化,面临技术和内容二元割裂、人才和数据双重短缺、制度和生态协同不足的现实困境。需要基于技术逻辑、价值逻辑与制度逻辑的融合视角进行反思,从操作层、支撑层、环境层赋能,积极推进技术范式和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劳动要素与数据要素的协同创新、制度革新与生态治理的协同保障,从而促进文化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质性跃迁。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高质量转化;文化资源优势;文化发展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1]文化资源是人类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对象化的、以符号系统与物质载体为存在形式的创造性劳动积淀,蕴含可识别、可阐释、可创造的文化基因、意义结构与审美价值等要素,为文化意义的生产、再生产及价值创新提供基础性条件。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不仅满足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驱动着绿色发展;更在深

层次上凝聚着民族认同,塑造着国家形象,并最终指向人类文明的传承、创新与跃升。在全球数字文明浪潮与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我国文化发展暴露出诸多结构性矛盾,制约了文化资源的有效转化与利用,亟待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突破与优化。因此,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不仅是对文化生产方式的数字化重构,更是对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型的实践探索,能为应对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从而推动文化事业

收稿日期:2025-12-12

作者简介:罗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2025SJZD00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中华文化主体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与路径研究”(25MLC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一、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底层逻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 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其质变必然引发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重构。新质生产力不仅凸显出物质形态生产力的跃升性变革，更体现出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思维跨越与范式转化^[3]。新质生产力与文化的内在关系，绝非简单的工具性应用，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生动体现。

（一）新质生产力对“怎样生产文化”进行革命性重塑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4] 新质生产力对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根本性作用，首先体现为对“怎样生产文化”的革命性重塑，包括物质基底的全面革新和认知思维的转变。

物质基底的全面革新，主要表现为载体革命、工具革命、空间革命三个维度。载体革命实现文化资源的普遍共享，工具革命推动劳动过程的智能化升级，空间革命重构全球生产关系的网络形态。一是载体革命。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表现，劳动形态演变直接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新质生产力加速载体的嬗变，数字化消解了传统载体的物理稀缺性，突破了物质形态限制，使文化资源从唯一性转向共享性，重构了人与物的关系。二是工具革命。传统文化生产依赖画笔、雕刻刀、舞台、印刷机等物理性劳动资料，其复制传播受制于不可再生性与时空有限性，使得文化资源易成为沉睡资本，其价值受物理形态制约。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智能技术突破传统工具的局限，推动生产工具的重大革新。马克思强调，“劳动生

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5]。新质生产力通过风格迁移、大语言模型等技术，使文化再生产的工具得以进化。三是空间革命。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6]。数字技术通过云存储与高速网络，将文化资源从有形的物理约束中解放出来，置其于虚拟场域，从根本上建构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新空间。传统生产空间重视地理集中，而虚拟协同空间则侧重通过数字技术突破地理空间的约束，实现全球资源实时配置，使文化生产资料突破国界，形成全球价值链。这本质上是将传统生产关系升级为全球数字劳动协作网络，推动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认知思维的革新，主要体现为存在论、价值论、方法论的审视。从存在论来看，新质生产力推动文化资源从静态的凝固资产向动态的创造性活动转变，其中隐匿的劳动实质上是人的自由创造性活动的体现。海德格尔指出，“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7]。“此在”作为“此之存在”，其本质不在于预先设定的属性，而在于其生存过程本身。“此在”不是现成的实体，而是“正在于物质生活需要之生产方法”^[8]。文化资源若被视为静态的现成存在，其存在意义将被固化。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将其转化为动态生成的存在，本质上是将文化资源从现成性中解放，使其成为正在生成的文化生命体^[9]。从价值论来看，福柯认为人的限定性即是指作为主体性的人总是“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他的具体存在在它们之中发现了自己的确定性”^[10]。劳动、生命与语言分别作为经济生产、政治规训和权力话语的实践场域，共同构成人存在的确定性基础。文化资源的发展契机隐匿于这些实践之中，而人的具体存在既在实践中有意义，也被这些结构性力量塑造与限制。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伦理重构、主体赋能与时间设计，将文化资源的发展从资本逻辑的逐物性转向人的自由发展的人文性，避免资本逻辑对文化价值的扭曲，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

文化发展优势的转化,指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的价值追求。从方法论来看,马克思指明:“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12]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需塑造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确保新质生产力推动文化显现而非文化遮蔽,即让文化资源以本真方式呈现。新质生产力若仅将文化资源视为数据资源,可能陷入文化载体的异化。应通过赋能,使个体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本真性文化生产者,实现个体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全面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实践场域和价值路径

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文化资源作为对象化的精神劳动,深植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化自然”物质生产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之中。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的转化,能够提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场域与价值路径。

实践场域是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动态空间。马克思认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3]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的转化过程正是当代人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的镜像体现,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广阔的实践空间。一是转化的场域根基激活对象化的精神劳动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4]典籍、技艺、符号、故事、景观等文化资源,是人类精神劳动的深厚积淀,构成了当代文化生产的关键精神生产资料

与基础性要素。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转化的核心,在于通过新质生产力对这些静态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激活、重组与赋新。例如,对传统手工艺进行数字化保护与创新设计,赋予其符合现代审美与功能的新生命;又如,对历史遗迹进行科技赋能的沉浸式展示,使其成为可深度体验的活态文化场景。这些正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实践形态。二是转化的场域动力推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机制呈现出鲜明的智能要素驱动特征,其核心在于知识、信息、数据等非物质生产要素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价值增值的核心动力^[15]。文化资源优势的转化过程,实质上是精神生产系统与物质生产系统在数字技术赋能下的辩证统一。以故宫博物院为例,其基于文物资源的知识重构与价值再生产,通过数字人文方法与创意劳动的深度耦合,强化精神生产的价值引领,促进物质生产的附加值提升,形成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增值效应。从文化资本到文化生产力的范式转换,展现出高质量的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场域。三是场域拓展支持数字技术重构文化生产与消费边界。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论断^[16],其本质是“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7]的观念表达。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区块链等技术,极大地拓展文化资源优势转化的实践场域边界。一方面,技术赋能文化资源实现数字化采集、存储、呈现与传播,如数字敦煌工程,突破物理时空限制,极大扩展其可及性与影响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催生出网络文学、短视频、云视听、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业态,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化消费场景和体验模式^[18],如虚拟偶像演出、NFT数字藏品。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化转化全链条,不仅提升效率,更创造全新的价值增长点,成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最活跃的实践前沿。

价值路径是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

势，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路径，既揭示转化的内在逻辑，也指明价值创造的升华方向。该路径不仅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更开辟了其价值实现的独特通道，生动诠释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进步内在统一的伟大构想。一是从价值内核看，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实质上是对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强调，在理想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9]，并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产品与服务通过满足精神需求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当文化资源通过创造性劳动升华为符号价值载体时，消费端构成感性实践的审美解放，使主体在文化解码过程中培育丰富且深刻的感受力，生产端形成自由劳动的现代性场域，劳动者通过符号编码生发超越基本生存需要的更高层次需求。转化将新质生产力从传统固定资本增殖的物化逻辑中解放出来，转向人的全面发展终极范式，从而获得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深远的价值指向。二是从经济动能看，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最终要体现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与经济效益。当文化IP、符号价值等文化资产通过创造性转化注入商品，便能在经济领域创造稀缺性溢价、情感附加值与叙事赋能，从而实现价值倍增。文化产业具有绿色低碳、知识密集、融合性强、附加值高等特点，其壮大发展能有效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对传统资源消耗型路径的依赖，驱动经济向创新、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这正是新质生产力所追求的经济效能提升的重要路径。三是从社会凝聚效能看，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体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内在向度上，文化符号体系通过“解构—重构”技法，筛除与当下社会脱节的成分，激活可与现有社会结构对接的核心意义^[20]，并在主体互动中产生契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意识形态效应。在外向维度上，把传统符号转译为可共享的文明话语，使地方性知识上升为具有普遍阐释力的思想资源^[21]，以参

与全球文明对话的方式，将文化发展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的叙事竞争。四是从文明跃升看，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与再创造。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2] 既定文化传统构成实践的客观条件，而转化行为则是主体对传统的批判性扬弃。此过程既非被动承袭，亦非断裂式重构，而是在历史连续性中注入时代理性，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守护民族精神本体的同时生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新文化范式，其价值高度在于将中国智慧升华为参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全面重构。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现实困境

我国文化资源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文化数字化转型具有时代必然性。《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4年）》显示，数字文化建设深入推进，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数字技术全面赋能传统文化保护、“红色文化”资源建设^[23]。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已成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关键内容和核心环节。然而，在技术和内容二元割裂、人才和数据双重短缺、制度和生态协同不足的综合影响下，新质生产力赋能面对着操作层、支撑层、环境层的多重困境，严重阻碍转化的质性跃迁。

（一）操作层的范式错配与价值异化：技术和内容二元割裂

文化资源是文化内容的生成根本，新质生产力驱动下，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高质量发展，绝不是简单地将技术视为承载工具，即技术与内容的二元相加，而是将技术与内容有机融合，生成文化表达的新业态、新形态、新范式。但当前技术与内容融合呈现出数字技术逻辑与文化价值逻辑的范式错配。一是技术逻辑的僭越，导致工具理性对文化价值的遮蔽。在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过程中，技术依循工具理性的内在逻辑不断扩张，使原本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外化的技术手段反过来挤压价值理性，形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24]。技术作为文化资本增殖的工具，数字技术对文化资源的视觉复现，恰是这种异化的延续——技术从人的“感性活动”退化为机械复制，剥离了文化意义再生产的实践理性，其价值创造潜能未能得到充分释放。以文化遗产的VR展示为例，多数项目局限于三维建模的视觉复现，未能通过空间叙事重构实现文化意义的再生产。技术的表象化应用，导致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呈现沦为电子标本，丧失文化遗产的实践理性和文化创新的本真价值^[25]。二是技术赋能的文化实践陷入符号复刻的陷阱，文化资源的深层价值未被激活。“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26]。区块链确权技术的滥用，将活态传承简化为静态的固化产权，实则延续了文化工业的标准化逻辑，即以技术合理性异化为支配合理性为内核，通过技术手段剥离文化实践的历史语境与集体参与性，使文化资源仅作为可交易的符号被机械复刻，而其深层价值未被激活。技术由此沦为文化工业的数字化翻版工具，非但未能解码文化实践的生成逻辑，反而以“确权”之名强化对文化多样性的规训，最终使技术本身异化为遮蔽文化失语的装饰性修辞。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27]这种异化现象在当代往往表现为技术拜物教，倾向于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简化为可量化、可操作的技术问题，从而切断了文化符号与其意义之间的丰富关联，没有深入理解文化实践内在的、系统性的生成逻辑与价值诉求。技术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与文化实践的真实需求之间形成根本性

的价值断层，加剧技术投入与文化价值提升的错配，表明技术拜物教切断符号与意义的非线性关联，未能深入文化基因组进行系统性解码，导致技术解决方案与文化实践需求形成价值断层，加剧了技术投入与文化价值提升的错配。三是文化内容生成和技术线性流程的操作范式错配，阻碍技术逻辑和线性逻辑的同频共振。马克思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8]，揭示环境与人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历史性产物，其技术赋能应回归实践的本体论逻辑。真正的文化内容生成应遵循“语境感知—意义建构—符号转化”的非线性实践路径，而非简单套用“数据输入—算法处理—界面输出”的技术线性流程。但当前的技术赋能多滞留在单点技术突破驱动的符号复刻层面，未能触及文化生成的实践本源，导致技术方案与文化实践在主体参与、价值共识、历史连续性深层需求的系统性脱节。

（二）支撑层的要素失衡与结构矛盾：人才和数据双重短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找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是教育的重要使命。”^[29]在科技发展浪潮中，人工智能作为前沿领域，其人才培养至关重要。而聚焦到文化领域，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同样面临着人才与数据方面的严峻挑战。支撑层的人才缺口与数据割裂叠加，使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滞后于技术迭代，文化资源的潜在价值被锁定于低效配置，难以释放其真正价值。一是人才结构断层引发高端稀缺性与跨界匮乏性的并存难题。《202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随着文化与科技融合机制不断健全，文化企业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持续增长^[30]。产业规模扩张虽带动人才需求总量增长，但高端创意设计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的供给缺口，已成为阻碍文化资

源优势向文化产业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瓶颈。与此同时，传统技艺的代际传承危机，导致文化资源活态传承主体缺失，高等教育中单一学科培养模式与文化产业融合化发展趋势的结构性错位，都进一步加剧人才供需矛盾。无论是传统文化传承还是新兴数字文化业态发展，均暴露出现行知识生产体系与现代产业需求的结构失衡。二是数据要素的割裂，加重权属模糊性、空间区隔性与领域壁垒性的叠加影响。数据基础制度密集出台，数据要素战略地位日益凸显^[31]。在产权维度，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需建设文化的大数据体系，但当前数据要素市场配置面临制度与技术的双重约束。公共数据与商业数据的权属分割，反映文化资源的公共性与数据资产的私有性之间的属性冲突，数据要素流通受阻，造成数据孤岛现象。在空间维度，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区域数据壁垒又制约文化资源的规模效应，形成数据分散的局面。在领域维度，垂直领域数据壁垒的存在，揭示数据采集标准与业务需求之间的脱节，导致数据要素的协同性不足，形成数据碎片化困境。三是要素组合的失衡，引发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转化过程中要素组合的系统性失效。马克思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2]，指明要素有效组合对解放生产力的根本作用。在微观层面，人才断层与数据割裂的叠加效应，易使文化数字化进程陷入形式复刻的陷阱，缺乏真正的创新。在宏观层面，用户需求升级与要素供给能力的落差，导致新质生产力驱动进程出现需求和供给断裂，阻碍人才、数据、技术的协同发展，最终表现为要素市场发育迟滞与文化再生产结构畸形。

（三）环境层的逻辑制约与路径依赖：制度和生态协同不足

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过程中，其深层效能释放正遭遇制度环境与创新生态的系统性阻滞，这是环境层逻辑制约和路径依赖

的具体表现。一是技术创新的指数级迭代与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存在结构性张力，导致监管框架出现时空错位。技术创新的非连续性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的转化显著滞后，进而削弱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能。新兴数字技术法律属性界定不清，导致技术方案合法性缺失，出现制度真空；同时，地方财政资金配置的风险规避倾向使政策工具与产业变革需求系统错位。技术监管、产业政策、金融支持等制度模块碎片化并存，创新活动面临多重制度摩擦。二是创新链条的孤岛化与资本供给的断层化相互叠加，触发生态复合性断裂。创新链条孤岛化源于多元参与主体的目标差异，以及激励相容机制的缺失，致使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结构性错配。新质生产力推动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的高质量转化，不仅需软硬件基础设施的频繁迭代与效能提升，更依赖持续资本投入以支撑技术快速进步与系统优化升级。然而，资本的短期逐利倾向与文化资产的长期价值属性存在内生冲突，导致耐心资本阶段性退出，从而在关键转化环节形成资本供给断层。三是制度约束与生态约束的交互强化效应，构成协同治理失灵的深层动因。文化高质量发展应结合所处生态环境和技术条件，形成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33]。微观层面，数字版权保护立法滞后与技术中介服务缺位，使文化企业落入高合规成本却低创新投入的恶性循环中。宏观层面，文化科技融合体系碎片化与文化数据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导致技术监管、产业政策、金融支持等制度系统功能离散，协同治理网络失调，新质生产力受困于制度摩擦与生态阻滞，文化资源优势转化动能衰减，其潜能释放被进一步抑制。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的高质量转化，面临着技术与内容割裂、人才和数据短缺、制度和生态失衡的三重困境。故此，

应基于技术逻辑、价值逻辑与制度逻辑的融合视角进行反思,从操作层、支撑层、环境层重构文化范式,推动文化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质性跃迁。

(一)操作层驱动:技术范式和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

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首要任务是,主动打破工具理性与技术还原论的认知限制。前者将技术异化为价值中立的工具载体,后者将文化降格为可量化的符号集合,二者共同导致文化系统的本体论遮蔽。遮蔽下的范式错配,不仅消解文化记忆的具身性与生成性,更阻断技术逻辑与文化价值的双向赋义。故此,提出以具身交互为基础、意义联结为中介、涌现协同为目标的文化范式,以此实现价值重构。一是突破“技术+内容”的简单叠加模式,转向技术作为具身化意义生成媒介。伊德指出,技术应成为“身体—文化”经验的延伸,而非异化主体性的力量^[34]。新质生产力驱动需超越视觉复现的表层逻辑,通过触觉反馈、空间叙事等具身交互设计,将身体图式与仪式符号的场域能量转化为可计算的感知参数,建立文化记忆的具身索引,并将文化逻辑转译为技术架构的生成性语法,使技术参数成为文化语义的结构载体,实现技术逻辑与文化价值的协同发展。二是激活文化资源的深层语义潜能,实现从符号复刻到意义再生产的范式转换。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揭示,文化符号的深层价值并非固着于能指层面,而是潜藏于沟通性记忆与文化性记忆的动态互动中^[35]。前者通过日常实践持续重构意义,后者则通过仪式化编码锚定文化内核。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应超越简单的数字化存档,构建技术与记忆的交互界面。通过人工智能构建的文化标注系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仪式符号等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可交互的意义单元,使公众能够通过协同标注和情境化叙事参与文化意义的共同建构,进而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意义联结网络,优化技术逻辑成为文化

记忆再生产的生成性框架。三是从线性“输入—输出”逻辑,转向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观的动态生成与协同机制。当前操作层范式错配的背后,实则是还原论思维对文化系统自组织特性的忽视与简化,将文化生产窄化为机械的数据处理流程,掩盖了文化作为复杂适应系统所具有的自组织能力。在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发展优势转化的过程中,应将技术实体与文化实践视为具有同等能动性的行动单元。技术作为外源推动者,而非主导控制方,通过转译与联结作用,将多样化的行动者整合为互动网络,在持续的相互作用中促使文化系统生成适应性的新形态,始终维系着文化本有价值的创造性核心。

(二)支撑层驱动:劳动要素与数据要素的协同创新

在数字时代,劳动范式与数字要素的深度融合正逐渐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关键力量。数据要素作为劳动在数字空间中的对象化体现,与劳动范式的协同创新,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重要支撑。一是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协同培养体系,以复合型能力提升应对技能断层问题。马克思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36]。以此为依据,可将高复杂度的文化生产活动分解为可系统培训的能力模块,并通过产教融合实现劳动能力的持续更新。具体路径包括:绘制文化产业链关键岗位能力图谱,精准识别文化与科技融合所需的跨领域技能短板;建立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平台,将非遗数字化保护、元宇宙内容创作等实际项目转化为教学实训模块;利用区块链等技术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动态技艺档案,将其学习路径与经验认知转化为结构化、可分析的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辅助传承提供数据基础,从而推动劳动能力持续提升。二是发挥数据要素潜能,以劳动价值导向的流通机制应对数据权属界定难题。商品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

动的单纯凝结”^[37]，而数据作为现代劳动产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38]。促进数据要素有效流通，需克服劳动与数据价值分离的现象，明确劳动贡献在价值分配中的核心地位。为此，可依托新一代生产力支撑技术，运用区块链智能合约对文化数据形成过程进行劳动贡献确权，将数据资产按劳动投入性质划分为基础采集层、加工整合层与创新应用层，并据此设计差异化的权益配置方案，统筹文化发展的公共属性与市场机制，实现劳动创造与数据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推动要素协同整合，将分散的劳动资源转化为有机联动的协作发展体系。建立以关键劳动节点为核心的支持平台，构建涵盖技能信息库、任务需求库与知识资源库的基础模块，借助双向匹配模型实现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对接。在此基础上，设计可量化的劳动贡献激励体系，将知识分享、协作创新等行为转化为可记录的贡献凭证，形成贡献与激励联动的良性循环。再进一步发展跨地域的劳动协作网络，采取民主协商与技术约章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规则动态优化与实时激励反馈，促进劳动组织向开放协同、自主创新的形态演进，从而为文化资源优势高效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提供系统化的协同动力。

（三）环境层驱动：制度革新与生态治理的协同保障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39]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的深层效能释放，正遭遇制度环境与创新生态的系统性阻滞。一是推动制度逻辑从路径依赖转向动态适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40]技术变革为打破传统制度惯性提供了重要契机。一是可借

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手段，实时追踪技术发展趋势，并依据模拟分析建立具有前瞻性的政策调节机制，使监管体系能够伴随技术进步而同步调整。其次，通过设立监管沙盒等包容性试验机制，为文化科技融合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提供风险可控的试错空间，以此激发创新活力，增强制度应对技术变化的响应速度与适应能力，从而为文化资源优势长期、稳定地转化为发展优势提供灵活且坚实的制度支撑。二是促进创新生态从孤立分散转向协同共生。当前，由于参与主体目标不一致，以及资本倾向于短期回报，创新链条存在脱节现象。为此，应构建多方协同平台，明确各主体诉求，并利用供需匹配机制高效链接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政府可通过设立专项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长期投向具有长期文化价值的项目，以缓解文化项目投资周期长与资本追求短期收益之间的内在矛盾。同时，应设计激励相容的合作机制，推动各类主体实现价值共创，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环境。三是构建整体性治理框架，实现从条块分割到系统集成的转变^[41]。当前治理体系存在职能分散、协同不足的问题，影响了制度与生态的合力形成。因此，需通过制度创新增强文化领域政策体系的连贯性与可持续性。应建立跨部门的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机整合技术标准、产业规划、金融扶持等政策工具。在此基础上，完善部门间的信任建立与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协作效能。四是需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决策程序，并深入推进文化数据平台建设，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环境。在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下，打破行政与市场壁垒，实现制度环境与创新生态的有效联动，从而持续提升文化资源优势转化的效率与质量，为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化的保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 会主义文化 [N]. 人民日报, 2024-10-29(1).
- [2][14][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70、100、98.
- [3] 罗兰.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产业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J]. 新疆社会科学, 2025(1): 142-143.
- [4][5][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70、349、501.
- [6]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M]. 刘怀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40.
- [7]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60.
- [8]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528.
- [9] 韩庆祥, 楼俊超. 论“新的文化生命体”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2): 7.
- [10] 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M]. 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408.
- [11][22][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470-471、591-592.
- [12][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8、192-193.
- [13][16][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7、420、134.
- [15] 向勇.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建构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5): 69-70.
- [17] 列宁全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08.
- [18] 周宣辰, 黄明理.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消费升级的逻辑框架、价值旨归与实践进路 [J]. 经济问题, 2025(3): 22-26.
- [19][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0、220.
- [20] 周建新.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性与逻辑意蕴 [J]. 探索与争鸣, 2024(7): 9-10.
- [21] 罗兰. 文化主体性视域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建构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1): 6.
- [23][31] 国家数据局.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4年) [EB/OL]. (2025-05-30). <https://www.nda.gov.cn/sjj/ywpd/sjzg/0530/ff808081-96b465bf-0197-200a135e-0536.pdf>.
- [25] 罗兰. 数字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遮蔽与解蔽——基于传播修辞学视角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5(4): 143.
- [26]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 [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08.
- [27]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45.
- [29] 习近平. 论教育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4: 95.
- [30] 国家统计局. 202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EB/OL]. (2025-06-27).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6/t20250627_1960269.html.
- [33] 聂鑫. 文化生态视域下农业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适用标准与实现路径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 63-65.
- [34] 伊德. 技术与生活世界 [M]. 韩连庆,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0.
- [35] 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87.
-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7-58.
- [4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41] 罗兰. 以域为媒: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媒介域建构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5(5): 41.

责任编辑: 吉强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6 年重点选题与征稿启事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双月刊)是由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主管、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苏中华文化学院)主办,以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以及相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为主要内容,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本刊重点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中华文化等,现为AMI扩展期刊,开设中国式现代化、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政党制度、新的社会阶层、民营经济、民族与宗教、中华文化等栏目,竭诚欢迎惠赐稿件。

一、2026 年重点选题

- (一) 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研究
- (二) 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研究
- (三)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四) 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 (五) 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
- (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 (七) 民营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 (八) 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
- (九)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 (十)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研究
- (十一)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研究
- (十二) 新就业群体理论与实践研究
- (十三) 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与共同富裕研究

以上重点选题供参考,欢迎广大作者据此结合研究专长和所关注问题自拟题目撰稿。对重点选题范围内稿件,本刊将优先选用,优稿优酬。

二、来稿要求

1. 稿件做到导向正确、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表达规范。
2. 稿件字数 8000 字以上,投稿平台: jsyb.cbpt.cnki.net。
3. 来稿请注明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单位名称、职称、职务等)、联系方式以及详细地址,并遵守相关学术规范(须有内容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部分)。
4. 稿件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查重率不高于 15%。每篇稿件参考文献不少于 5 条。

三、几点声明

1. 本刊对决定采用的稿件,有权进行必要的修改,并拥有该稿件的编辑权、汇编权、翻译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发行权等权利。作者一经投稿,即视为同意本刊所声明的一切权利。作者需保证稿件的原创性,且不涉及保密及其他与著作权有关的侵权问题,否则一切责任由作者自负,本刊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来稿一律不予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凡两个月内没有收到稿件的修改意见或用稿通知,作者可以自行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 本刊已被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龙源期刊网数据库,以及 CNKI 系列数据库收录,并由其对外提供信息服务,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刊不以任何名义向作者收取费用。

采编平台网址: jsyb.cbpt.cnki.net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编: 210007

电话: 025-84287222

传真: 025-84287298 转 7221